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NSD

第010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

2022年10月

目 录

本期导读	01
学术聚焦	02
经济增长的挑战与制度变革的逻辑 姚洋	02
中国经济绩效的逻辑与体制特征 刘守英	06
对话：中国经济的挑战与制度变革的逻辑 姚洋、刘守英、文钊.....	10
月度精选	14
经济学家的时代机遇和授人以渔的经济学教与学之道 林毅夫	14
细处求精 宽处谋局 周其仁	21
中国经济的韧性 姚洋	27
伯南克做到了“不浪费一场危机” 黄益平	33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能够成功的条件与机制 ——三个典型产业案例的初步研究 范保群、陈小洪、刘超.....	36
数字时代的劳动力市场：转型与挑战 李力行、莫怡青、周广肃.....	39
学院资讯	41



本期 导读

北大国发院简报

第010期

亲爱的读者：

感谢您的订阅，《北大国发院简报》第10期与您见面了。每一期，我们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在信息过载、高噪音、碎片化的时代，为您精选高质量的内容，同时也方便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深度阅读。

本期简报主要内容仍是“学术聚焦”与“月度精选”两大部分。

“学术聚焦”的内容来自我们9月14日举办的第6期承泽论坛“中国经济的挑战与制度变革的逻辑”暨《制度与经济增长》新书悦读会。姚洋教授介绍了《制度与经济增长》这本书的出版背景以及诺斯的制度主义学说，梳理了中国制度实践，并提出了经济学者研究中国制度可以努力的方向。刘守英教授详细剖析了制度和体制、微观或宏观制度、行为与经济效果之间的异同和关联。圆桌对话环节，《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文钊就一系列重要问题提问，两位学者做深度

解答与讨论。

本期的“月度精选”包含六篇文章，分别是林毅夫教授对经济学教与学之道的分享，周其仁教授对于企业如何在严峻环境中图存的建议，姚洋教授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韧性的判断和对短期挑战的应对建议，黄益平教授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南克新著《伯南克论大萧条：经济的衰退与复苏》一书所作的推荐序，国发院金光讲席研究员范保群、助理研究员刘超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小洪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研究，以及国发院教授李立行、博士研究生莫怡青和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周广肃关于数字时代劳动力市场的观点。

感谢您的阅读，也欢迎您的反馈。在简报最后，我们附有订阅二维码和联系方式。

主编：黄卓
执行主编：王贤青
2022年10月31日



经济增长的挑战与制度变革的逻辑¹

姚洋

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

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首先，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制度与经济增长》这本书的缘起。

这本书是《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一书的修订再版。1998年我博士毕业不久，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在策划“与当代学术大师的对话”丛书，编辑谢雪找到我，希望我能写一本“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对话”一书。我当时非常犹豫，毕竟要拿出那么多的时间来写一本书，需要很大的决心。

后来我为什么答应写这本书？源于一个心结。我在读博期间的专业是制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我到世界银行应聘，当时的主考官问了我很多新制度经济学的问题，我答不出来，自然也没能获得这份工作。我有些不服气，从此有了一个心结，希望能把新制度经济学弄懂弄通。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投入大量精力，也专门去拜访了诺斯老先生，终于写成这本书。屈指一算，距今已有近20年。如今在贝页图书的策划下，文汇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这本书，定名《制度与经济增长》。

《制度与经济增长》大体保留了前一版本的主要内容，也做了一些修订，比如删除了一些章节，增加了诺斯老先生晚期两本书的内容。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新制度经济学慢慢演化成了新政治经济学，这部分内容也做了新增。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诺斯的制度主义学说；二是中国的实践；三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在我看来，诺斯后期的观点不如前期的观点有弹性，如果诺斯有机会仔细研究中国的实践，恐怕会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该如何总结中国？如何贡献自己的思想？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诺斯的制度主义学说

诺斯是一位大器晚成的经济学家。他在48岁之前主要研究经济史，48岁之后才转向制度研究。诺斯之所以转变研究方向，主要是因为他访问欧洲的过程中发现制度是一个重要变量。在

1. 本文根据姚洋在2022年9月14日北大国发院承译论坛第6期上的演讲整理。

与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开篇，诺斯开宗明义地阐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今天的我们该如何理解诺斯这句话？在我看来，今天人们谈论的所谓“经济增长的动力”，基本都是经济系统本身的内生元素。比如我们常说储蓄、投资、教育很重要，但中长期来看，这些都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变量。比如大家都公认“教育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就快”，实际上如果一地的经济水平很低，其教育水平也不可能高。因此这是一组内生的变量。

诺斯通过研究欧洲经济史，发现了一个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变量——制度。随后，诺斯尝试用制度来解释经济系统的增长过程，把经济学研究一下子推到了一个新领域。事实上诺斯研究的影响非常深远，已经远超经济学范畴，对社会学和政治学也产生巨大影响。诺斯也是极少数影响力超出经济学范围的经济学家之一。

诺斯早期的思想脉络很清楚，就是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方法研究制度的产生、演变及其对经济的作用。他研究的第一个命题是“产权是重要的”。基于其在欧洲的经验，诺斯认为欧洲的兴起主要就是由于建立了产权。如果他有机会研究中国的话，恐怕要修改结论。

中国私有产权的出现时间不晚于北宋。唐朝还有类似“井田制”的做法，即政府掌握了一些公地，给老百姓分。北宋时政府对土地管得很少，甚至像兼并这一类的事情也很少过问，几乎就是土地私有。如果说土地产权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动力，那从北宋开始，这一动力就已经开始发力。诺斯研究的是欧洲的中世纪，那是真正的封建社会，相当于我们东周的战国时代。在那个时代，欧洲土地还是公有，或者叫三田制。农奴或半农奴给领主们打工，土地属于领主。后来欧洲暴发黑死病，人口数量大幅下降，劳动力价格随之上升。这样一来，土地越发变得私有化，因为农奴开始要求自己的权利。以上是诺斯给出的解释。

诺斯研究的第二个主题是宪政的作用。他和合作者写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把原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可信承诺”，移植到制度研究领域，用“可信承诺”来研究英国光荣革命后产生的制度。在诺斯看来，英国光荣革命的一大成就是完成了“可信承诺”。比如《权利法案》的实施让英国国王失去了很多权力，但在让渡权力之后，国王的借款能力反而大增。英国用这些借来的钱打仗，构造出一个现代的英国。诺斯认为，英国国王把一部分权力，比如借款和同意的权力让渡给议会，这意味着国王做出了“可信承诺”，即“我让你们来决定！看看我这个提议是否可信。”议会里都是有钱人，国王实际上就是在向议会议员们借钱，这是诺斯的早期研究成果。当然，诺斯还有许多其他的研究，今天我不再细说。在我看来，诺斯对今天最有意义的研究就是关于土地产权和可信承诺的研究。

诺斯在晚期还写过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暴力与社会秩序》，他和合作者提出用秩序（social order）来解释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书，诺斯和他的合作者希望构造一种新的诠释，核心概念就是秩序。诺斯认为国家的任务就是设法克服暴力、控制暴力，然后建立起秩序。起先建立的秩序是限制性秩序。这容易理解，因为要控制暴力，很容易想到的首先是限制权利。但这不是一个好的秩序，好的秩序是开放性秩序。在诺斯看来，一个国家必须要过渡到开放性秩序才能获得发展。

在《暴力与社会秩序》的前言，诺斯认为中国还处于限制性秩序阶段，但与此同时他又似乎认为中国是成功的。诺斯也承认，他的专业并非研究中国，或许值得中国人接下去研究，将来可能打破这套理论。但诺斯并不希望其理论仅被用于解释欧洲，他的一位合作者曾在世行供职，因此诺斯也曾尝试把这套理论用到非洲，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用他们的理论来指导那里的制度变革。不过看起来该理论似乎更适合解释欧洲。

诺斯的理论使用的工具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比



较成本 - 收益分析。这种方法难以研究制度变迁的过程。诺斯不懂博弈论，这是他无法研究制度变迁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早期做过一些博弈论工作，后来是阿西莫格鲁把博弈论方法发扬光大。他用动态博弈的方法研究制度变迁，这是其主要学术贡献。但从思想层面来说，阿西莫格鲁没有太多理论创新。他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这一点诺斯早就说过。后来他和罗宾逊提出包容性制度和排他性制度，这与诺斯所说的开放性制度和限制性制度基本一致。我曾与诺斯讨论过这个问题，诺斯表示自己已老，对于其他学者的模仿行为也不去管了。阿西莫格鲁当然很有名，我觉得他的奋斗目标是奔着诺贝尔奖去的。他能否如愿以偿？这要看世人如何评价他的理论贡献。在我看来，阿西莫格鲁的贡献主要是方法论贡献，而非思想层面的贡献；在思想层面，他基本上是在重复诺斯的主要思想。

中国的实践

我认为中国的实践既不符合诺斯的制度两分法，也不符合阿西莫格鲁的两分法。换句话说，中国的实践既不是开放 vs 限制，也不是包容 vs 排他。中国的实践是让这个两分法失效的案例。

回顾一下改革的历程，中国的实践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意地模糊制度，而不是把它搞清楚。上世纪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是最好的例子。当时我们去乡镇企业调研，企业老板认为企业说到底是自己的，只不过在乡里戴了顶“红帽子”，因为那时候政策不允许私人办企业。不过乡政府则认为企业是乡里的。在实际操作中，大家都是心知肚明，但却都在有意模糊这个概念，因为只要能把事情做了就行。很明显，诺斯和阿西莫格鲁的两分法在这里失灵了。这种情况是包容性还是排他性？诺斯可能会说，这至少是一个限制性进入的秩序，前面说过，他曾明确表示中国的实践是一种限制性的制度或秩序。

然而中国的实践成功了。我们不断地摸着石头过河，经过多年积累，付出了较小的牺牲改革了制度。相比之下，苏联和东欧那种快速地、一清二白地过渡到所谓开放性秩序的方法，成本极为高昂。

我认为诺斯提出的二分法最终没有逃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范畴。无论是诺斯还是阿西莫格鲁，他们的倾向很明显——开放性的制度优于限制性的制度，包容性制度优于排他性制度。诺斯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明确表示，从限制性制度转化到开放性制度，这是一个直线进步的过程，那些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主要因为它们还停留在限制性制度阶段。

我认为这种分法有很大的问题。好多发展中国家所谓的限制性秩序，比如劳动用工制度都是殖民者的遗留，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印度有很多法律都源于殖民者，现在印度也在考虑改掉这些法律，这一过程显然不是直线型的，而是混杂在一起。在我看来，这种大笔一挥的两分法会遮盖很多有用的东西，也会阻碍知识的获取和进步。

按照两分法的逻辑，肯定是开放的政治制度更好，包容性的制度更好。什么叫开放的制度？就是完全民主，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这听起来好像很有感召力，但不妨看看美国的情况。特朗普犹如一匹黑马杀入政坛，但他却不具备治国理政的能力。这足以引起反思，从中国的角度，特别是从儒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实践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抽象的政治平等也许是一剂毒药。

西方的政治哲学从来不谈层级，只提等级，而等级是受批判的。整个西方现代化的历程，就是一个推翻等级制度的过程。然而一个国家的治理如果不存在一定的政治层级是不可能的。除了小国寡民，比如只有几千雅典自由民的古雅典，喊一嗓子大家都能听见，在这样的地方才有可能实施直接民主。除此之外，没有哪个国家敢说自己是直接民主，因此治理国家所以必须要有政治层级。

然而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没有为层级做出辩护。我们的儒家理论则不然，儒家相信每个人的天资不同，努力程度也不同，最终，有些人更加符合圣人的标准，有些人则距离圣人的标准相去甚远。很明显，前者更应身居高位，管理更大的事务。这就是选贤任能。所以在中国古代，选贤任能是个宪法原则。不符合某一层级资质的人，可能压根无法进入这个层级。

尽管中国的实践与西方那一套并不相同，但中国的实践已经在古代有过成功的案例。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选人用人方法，也体现了选贤任能的原则。在我看来，这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题目。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领域研究出好的成果，再以世界听得懂的方式对外传播，不仅对提高文化自信有帮助，对改进民主制度也大有裨益。今天的民主制度，走入了民粹主义的泥潭，这中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

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家的责任在哪里？应该从中国的制度变迁实践中提炼出新的理论。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我常说，中国经济学家就坐在一座金山上，我们应该努力地在自家

地里挖金子。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也应该从中国古代先哲们的思想中发掘新思想和新理论。在我看来，先秦思想家们的理论和后世实行的制度应当分开，我们现在是混为一谈。比如一说到儒家，就认为儒家思想是为封建专制制度辩护。有这样的偏见就没法做研究。其实孔子、孟子和荀子都没那么想过。我们需要回到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时代，研究他们的思想，把这些思想盘活并且变成研究对象，而不是把它们作为学问去研究。我相信这是可能的。

西方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重新挖掘了古希腊的思想。现在有的学者经常拿孔子和黑格尔比较，这简直是关公战秦琼，完全错误的。孔子和黑格尔相距将近两千年，怎么比较？孔子和柏拉图更可能比较，但比较的结果会发现，孔子并不比柏拉图更偏好专制。

这就是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群星闪耀的辉煌时代，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数量并不比古希腊的少，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也不比古希腊的差。如果能把中国的实践和古代先哲们的思想结合起来，我们就有机会创造出属于中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哲学家自己的思想。



中国经济绩效的逻辑与体制特征²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我与诺斯的渊源是早经林毅夫老师推荐，翻译过他的一本著作，后来一直保持交流，还曾专门邀请他的合作者瓦里斯来人民大学做过为期一周的研讨。诺斯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都曾对我产生影响。

姚洋老师在介绍他的《制度与经济增长》这本书时，提到道格拉斯·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我认为诺斯他们新近关于权利限制秩序和权利开放秩序的理论值得关注，但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不能简单套用，我们需要就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进一步研究下去。

制度与经济增长中的两个问题

在关于制度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入，即“制度与体制”和“经济绩效”问题。

大制度与小制度

在座各位如果一提到“制度”就很容易想到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我把二者归为“大制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他想进入的“共产主义制度”都是一种社会形态，但冷战后这种社会形态就变成了两种制度的竞赛。因此，讨论“大制度”就是讨论一种作为社会形态的制度。遗憾的是，后来它们变成了被意识形态化的制度。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化”，不光是我们有些人在说到制

度时比较意识形态化，美国人也一样。我在波士顿看到有些小孩在看升他们国旗时哭得非常厉害，那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动，这是制度被意识形态化的表现。

诺斯他们定义的“制度”，我归结为“小制度”。“小制度”实际上研究的是世界运行过程中那些相互博弈的规则。制度经济学家试图将制度研究纳入主流研究，那么首先在微观上就要解决制度与人、组织之间的行为关系，要把制度落下来，落到人和组织的行为如何受制度的影响，这也是姚老师刚才提到的诺斯那句名言“制度是重要的”。因为制度是重要的，所以要打通制度跟微观主体行为之间的连接，诺斯在他得诺奖的那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花了很多功夫来建构这个理论。

其次，在宏观上，制度研究是要解决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包括诺斯解释的国家行为、意识形态和产权等制度。因此，研究小制度关注的是具体规则，即在世界运行的过程中，微观和宏观制度与行为、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研究各项制度在世界运行中如何发挥作用。

周其仁老师那篇讲“体制成本”的文章对我影响比较大。体制成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当我们去观察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时，发现它们跟诺斯讲的小制度并不一样。另外，将制度简单二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非常要命的，因为在同一个大制度下有很多小制度在运行，同时，由各项小制度组成的体制也可能存在于不同

2. 本文根据刘守英在2022年9月14日北大国发院承译论坛第6期上的演讲整理。

的大制度下。

我到人民大学后给研究生开过一门课讲“比较体制”。这一课题在上世纪90年代非常风靡。后来前苏联垮台，在东欧转轨以后有关比较体制这一脉的研究就基本消失，只留下科尔奈（匈牙利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科尔奈所著的《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他在哈佛大学授课时用的教材，里面所谈到的体制问题是基于他对匈牙利和东欧等社会主义体制的深刻认识。他讲：“体制实际上是支撑整个大制度的一件衣裳”。这意味着，我们如果单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去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话，是讲不清楚制度在那种形态下是如何运行的。

体制这件衣裳由不同的一块块的布料组成，各块布料就是各种小制度，比如科尔奈讲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产权、经济运行和微观制度等，这些都是诺斯他们研究的小制度。从体制研究的角度来讲，要研究在一个大制度下运行的这些小制度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科尔奈说，各种制度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决定了各种制度之间的适配性，后来我将这种适配性称之为“体制秩序”。体制问题最后还是在讲秩序问题。诺斯在晚年研究的制度问题是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从限制权利到开放权利形成的秩序，而科尔奈讲的是由各项制度之间的适配性形成的秩序。

经济研究不能只解释“有效”，也要研究“坏年景”

“Economic Performance（经济绩效）”是诺斯创造的一个词。他认为在长期的经济变迁过程中，不是只研究经济增长，还要研究经济不增长，反映到现实世界中就是——我们不仅会经历好年景，也会经历坏年景。诺斯认为，做研究不能在解释平均率的时候只解释好年景怎么“好”，而忽略坏年景为什么发生。所以，诺斯在其晚年所著的《暴力与社会秩序》这本书中，对早期关于西方世界的研究也做了反思。他早期的研究只

是对“有效”（经济增长）做了解释，比如因为有效产权、有效组织、有效市场，所以经济得以增长，但同样的制度为什么也会造成经济收缩呢？

由于经济增长的平均率缺少对“无效”（坏年景）的解释，所以从政策含义来讲，最后解决问题的药方就是“一把抓”。好年景是因为制度有效、投资有效、人力资本积累有效，于是现在一拨追求高增长的人还是在用“再增加投资、再增加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改革把制度搞对了”这套逻辑，最后缺乏对导致负增长的问题进行研究，结果也还是用为正的策略去应对。姚洋老师讲到的诺斯等人的最新研究，就是将经济绩效进行了分解，既解释了经济增长，也解释了经济收缩，这才是更好的理论。

因此，我们所做的大量研究就是从长期的经济史来分解经济绩效的“正”和“负”。我们研究了英国、法国、丹麦、瑞典、荷兰和意大利在1820年至2018年的经济绩效，具体分析了这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收缩的频次与幅度。

可以看到，在历史长河中，六个经济体既有经济绩效（即有增长），也有收缩。按我们一般的理解，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增长。但从数据来看，最后决定这些国家发展水平的并不是一直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是不断缓和的经济收缩（收缩频次和幅度下降），即经济绩效中增长为负的那些年份不断减少或收缩幅度不断减弱。这样的结果就很有意思，它将我们的研究视角从原来关注经济增长的平均率转向去解释坏年景发生的原因。

对“国富”和“国穷”的解释也是如此。我们对170个国家在1960年至2010年的经济增长与收缩做了研究，发现贫穷国家并不是没有经济增长，有时候它们的增长率一点也不低，但这些国家的经济收缩幅度和频率太高。这些国家总是在折腾，一会儿打仗，一会儿总统倒台，一会儿高通胀，一会儿又发生种族矛盾冲突，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导致其经济收缩频率和幅度非常高，最终导致国家陷于贫穷。



所以姚洋老师讲到，贫穷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在发展早期，并不是没有经济增长，而是它们的权利开放秩序和权利限制秩序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精英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没有完成。这一转型具体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精英之间创建支配性联盟，通过政治体系操纵经济利益，创造租金，依靠协议在精英之间划分租金，通过掌控特权和限制组织准入来获取租金；第二阶段，也是发达国家成功的原因，即通过权利开放秩序实施“非人格化规则”，利用第三方控制暴力，开放组织创建准入，最后实现秩序的稳定性。

这是诺斯他们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进步之处是他们把整个研究视角扩展到经济收缩的原因。但正如姚洋老师所讲，诺斯解释的基本上还是发达国家的模式，即精英支撑的现代化经济、精英结盟形成的秩序结构和转型。

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收缩与经济绩效

在诺斯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收缩进行分解。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也不是没有增长，且平均增长率也挺高，当时的问题在于经济收缩频率和收缩率很高，所以当时也不是没有经济绩效，只是经济绩效被坏年景拉低。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绩效发生了重要变化，不过原因并不只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更高，还有经济收缩的频率和幅度明显降低。

从这里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结论，原来那种照葫芦画瓢研究中国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需要根据中国的实践检验所谓的经典理论，并做出必要的创新。

中国的整体体制秩序和制度弹性

用诺斯那套理论来看中国问题时会发现，中国不是简单的像西方那样从权利限制秩序转向权

利开放秩序的过程，而是我前面讲的中国所具有的体制特征。这个体制特征是，中国的秩序结构是整体体制秩序，不是诺斯意义上的那些小制度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体制的效率和秩序建构。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不低，中国的经济绩效也还可以，但是问题出在经济收缩幅度大。因此，我们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研究应包括两个部分：

首先，我们在研究计划经济整体体制特征时，不能仅看到产权和价格机制的特征，还应包括制度结构、价值体系、计划制度和微观制度的特征，这些形成了社会主义整体体制的特征。

其次，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对改革路径的选择上，中国和前苏联都存在巨大差别，主要表现为中国维持了整体体制的秩序。

第一，前苏联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整体体制是铁板一块，而中国的整体体制特征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就和前苏联有很大不同，包括制度结构、意识形态、计划制度和微观制度等。我们是一套整体体制，但又不是前苏联那样用计算机计算投入产出的系统，即我们整体体制的程度比前苏联要弱一些。

第二，我们的整体体制具有弹性和可调适性。当整体效率出现问题而影响到体制秩序时，我们的整体体制就展现出它的灵活性。最主要的表现是中央下放地方权利以及增大微观活力，这在前苏联从未有过。

体制的弹性与整体体制的程度，这些特点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下滑但改革开放后保持了往前冲的势头。而大家看到苏联的故事是，体制越有问题，意识形态、权力结构、资源配置效率、微观主体塑造等方面就越僵化。中国不是这样，即便像毛主席那么强的人，当他看到大跃进出现问题时也会选择往回退。这些中国与前苏联的区别，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地方。

当出现大问题时，我们体制的弹性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是在整个计划体制内的各个方面都

做权利松动以及增加企业活力。这保证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体制的效率跟改革开放之后有差异，但是整体体制的弹性又保证了改革开放前的经济绩效也能过得去，没崩盘也不会崩盘。

改革提升了整体体制的开放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利开放的过程，并且不是仅针对某一项制度的开放。因此，我们现在研究改革时，如果只是简单地从市场、产权去看整个改革，就会一叶障目。有些人只从市场化、私有化的角度去批判改革者，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只是西方意义上的市场和产权概念，中国的改革并不仅仅是这样。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经济收缩下降，首先得益于我们具有体制性权利开放的特征，其次我们在权利开放过程中维持了秩序结构的稳定。我们的体制性权利开放，是针对一整套体制性权利的开放，不是仅针对某一两项制度的权利开放，我们是对整个体制的重构。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现在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并存。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原来是按劳分配，后来加入要素分配，再后来又加入了市场配制资源。这样的制度构建过程一直是权利收紧向权利开放的转变，这其中包括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姚洋老师讲到文化问题。当我们仔细去反思文化问题会发现，一个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时必定会经历一场自我批判，因为这时我们会开始认识到传统的不足。例如“五四”时期与改革开放之初，所谓的“启蒙”就是我们认识到原来体制的不足，于是我们一定会经历一场文化批判。而在进行文化批判的同时，我们也接受着一些具有人类共识的现代化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的影响，比如我们对市场的认识，这些影响最后为我们带来物质的现代化。而当物质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一定又会去寻找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意识，即我们的主体价值。这些主体价值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构建我们的文化自信，这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含义。

此外，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体制以及塑造微观主体，这些实际上解释了我们经济绩效的来源是一场体制性的权利开放，而不是对某一项制度的简单私有化或者市场化过程，是整体的体制性权利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过程。

同时，我们的体制转型跟诺斯分析的西方意义上的体制转型——从限制性权利秩序向开放性权利体制秩序——也有不同，二者最大的差别是对秩序本身的认识不同。他的认识是，两个精英集团为了共同获取租金而进行结盟，获取垄断租金，所以建构起限制性的权利秩序。但中国的整个权利开放过程是一种体制性的开放，不是由精英结盟推进的权利开放过程。

因此，我们要对改革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以及我们在权利开放的过程中如何维持体制秩序。前苏联解体以后的第三天，我到了莫斯科。当时令我印象很深的是，当那一整套体制突然退去之后，整个社会的运行让人难以理解。当时一位苏联社会科学院的院士接待我们，但他联系不到任何一个人去完成后续的接待工作。苏联在整体体制开放后没有考虑到维持体制的秩序结构，但中国则考虑到了秩序结构，包括权利开放的顺序。还有大家经常讲我们的“双轨制”，很多企业的属性和权利边界是模糊的。很多模糊的东西在西方看来是没有效率的产权结构。另外我们在思想的解放与吸收、市场秩序的维系以及各个主体之间的平衡，都形成了我们的体制秩序。

这次与姚洋老师一起分享他的新书，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是提醒我们，对中国很多问题的研究要寻找到具有中国独特性的东西。那些独特性的东西到底在哪儿？对于那些独特性东西的研究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中国经济伟大的转型和变迁。这就呼应姚老师所讲：我们作为经济学家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这里为我们做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土壤，关键就看我们能不能针对中国转型期的独特性问题做出原创性的研究。



对话：中国经济的挑战与制度变革的逻辑³

姚洋

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
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文钊

《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

文钊：姚洋老师和刘守英老师作为经济学家，给自己也给当代经济学研究者设定了非常高的使命，要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去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与发展。请两位老师再详细讲讲，应该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解释？

姚洋：我们从新古典经济学里学到的分析方法，比如成本收益方法、博弈论方法，还是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的。只不过不应该把西方理论直接套用到中国现实上，而是应该还原到方法层面。

想解释中国制度变革的成功，也许应该这么说：这个制度为什么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二分法，非黑即白，而中国的制度演进是不断寻找最适应当时情况的制度。所以在我看来，我们的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寻找适应性的制度”。这大概是我们成功的逻辑。

这个问题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有比较深入的讨论，但是现在中国可能到了一个新阶段，需要我们构建新的理论把制度说清楚。

我们的重点不能只放在中国怎么成功，因为支持西方理论的人会说：这只是个过程，中国最终还是会走到开放制度，只是给他们的理论再增注脚。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说——过去四十多年，包括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际上一直在形成一些不同的东西。这个“不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需要我们去研究。但首先我们应该对此有自信——中国已经形成了“不同的东西”，而且这个“不同的东西”是可以长期存在的。

这当然是对西方学者和西方制度的一大挑战。有人认为现在中美之争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学者在向美国挑战，但这一想法也是西方的自我矮化。如果我们自信地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东西，就应该大声讲出来，这不仅关乎民族自豪感，也是对人类负责、对历史负责。

说远一点，中国过去这么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在我看来最成功之处就是回归中国传统。大家可以仔细想想，我们政府这些年的做法的确是在回归中国传统。传

3. 本文根据姚洋、刘守英、文钊在2022年9月14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6期上的对话整理。

统是有生命力的，我们要想办法使之现代化。

我们要勇于把这些“不同的东西”讲出来，这样才能赢得世界尊重。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有一位汉学家，自己把很多中文文章翻译成英文，其中包括我的不少文章，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我跟他联系过，问他有没有基金支持？他说没有，完全自愿。这说明这些内容给了他触动。

所以，只要我们自信地以一种西方能听懂的语言把我们自己的东西讲出来，可以在世界上占一席之地。如果不讲任何道理而生硬自夸，只会让人反感。这是不同的取向。

刘守英：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认识到中国这些典型事实跟已经成功过的典型事实不一样，所以需要我们花很大功夫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研究中国问题，首先应该花功夫明确这些问题的独特性究竟是什么。如果简单套用一些借用的概念来研究中国问题，在用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匹配。

我们以前对很多“拿来”的概念不进行深入思考，看到产权在发达国家有效，我们就以为清晰产权就可以轻易建立；市场有效，我们就以为市场就能轻易搞完整；民主程度提高有效，就可以把民主照搬过来。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与经典理论不符的制度在中国用起来还不错？中国为什么是当下的存在？

举一个例子。1980年代我参加遵义的全国试验区土地大会。两派观点非常明确，讨论很热烈，一派认为唯私有化才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另一派认为一定要把土地国有化，但没有几个人赞成集体所有制。我们到农村去调研，农民既不清楚也不在乎到底土地是要私有还是国有，他们关心的是集体所有制被成员权以后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后来提出的成员权集体所有制，是有别于原来的传统集体所有制，是以成员的资格来获得土地权利的一种制度安排。这时候我们看到的

问题，就是现实中的集体所有制跟理论上的集体所有制是不同的，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

所以同一件事情在中国的走向和在西方的走向可能并不相同，中国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无法用移植来的概念简单解释或解决。二战以来，没有一个国家成功走通了制度移植之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亦如此，最极端的时候是“五四”时期，不仅提出制度移植，还提出把文化全部改变。中国共产党走的既不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也不是完全西化之路。

因此，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公共讨论都需要花很大功夫，去仔细研究中国现存事实的道理。我并不是说中国的事实都合理，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制度只要被锁定，就会出问题，如美国现在这样。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只要是在为找到解决现有问题的方案而不断变革，这个国家和制度只要在往前走，就是有它的道理。任何一个制度，哪怕是现在认为最优的制度，只要被锁定不变，终究会出问题。

对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我们要多去观察，多去问为什么。不要简单地定性对错，要讲清道理何为。这是理论研究和公共政策都要花功夫去做的。但要防止“你的制度不行，我的制度就是最好的”这种简单的“大词主义”。制度不是非黑即白，所有制度都一定要不断往前走，不断解决现实问题，这个制度才有希望。

文钊：在两位老师看来，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由哪些原因导致的？

姚洋：经济增长不可能速度永远都超过10%，这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总有负反馈因素，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疯长。中国的减速从中期来看是个自然的过程。

现在总有人说改革还不够，还要继续改革，重启改革，等等。我经常反问他们：“还改什么？”他们却答不出来。很多人其实把体制问题和政策问题混淆了。比如，农村集体土地入市，修改过的新版《土地法》其中一条是集体建设用地可以



入市，同等对待，但这几年一直未能推行。这是体制问题吗？了解背景的人都知道，这是管理问题。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政策问题或行政问题，而非体制问题。

刘守英：无论是从历史看，还是从国别看，经济高增长的时段最多是二十多年。这是规律性的，所有赶超型、后发型国家均是如此。韩国、日本等东亚经济体大约维持了28年左右约6%的增长，后来就自然减缩。

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是，从原来10%的增速降到5%、6%的增速，对我们整个社会而言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以前过惯了10%的日子，现在如何适应5%的日子，这非常关键。现在很多人还在用10%时期的思维去解决5%时期的社会问题，这不可取。

很多人仍相信能回到高增长阶段，即使回不到10%，只要努力也能回到8%，所以还在思考如何把增速拉高，这种想法非常有问题。10%到5%，规律性地下台阶之后，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过好5%的日子。

原因在于：第一，增速已经拉不上去。我们有研究，以土地为例，以前，地方政府的确缺地，但现在各地方真不缺地，有地卖不出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发展到此阶段，土地需求自然下降。中国企业不可能一直靠低价土地来维持在世界上的竞争优势。其他很多东西也一样，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生变。

第二，我们要避免“休克性”政策。现在一些政策之间相互“打架”，结果可能会把事情搞“休克”。比如，从2014年以来，采取“开前门堵后门”，允许地方借债。虽然堵住了土地抵押融资，但最终造成了新问题。因此，问题不能说是不改革，是改了很多，互相矛盾。

因此，增速降下来之后，我们一定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政府和市场主体要会过低增速的日子；第二，对于当下的政策如何转过去一定要深入研究。不能认为一睁眼就能转到彼岸，没有

这种事。我们整个体制转型的过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解决问题，往前走一步，然后找到新的耦合和适配性，再往前走一步。

文钊：刘老师常讲“以地谋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但如果试图以雷霆手段走出这一模式，又会导致很多连锁反应。这条线怎么改？应该如何看待现在的土地财政问题、高房价问题，以及房地产的低迷情况？

姚洋：2014年修改《预算法》，我个人看来其实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做出的“妥协”。1994年的《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借债，地方政府不能有赤字。但二十年来地方政府早已赤字，借债很多，所以中央政府不得不修改《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借债。因为地方政府有非常大的融资冲动，要融资就得用土地抵押，所以大规模开发土地，形成了这一循环。现在土地需求量下降，此循环失灵。

要解决此问题，需要给地方政府找到其他税源。很多人反对征收房地产税，认为这是存量，不能动，应该征流量税。我不是研究税收的专家，但我看到房地产税在其他国家是地方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于既有财富征税的效率损失最小。我个人仍坚持认为，这是我们地方财政唯一的出路。

地方政府每年卖地收入有好几万亿，占地方财政收入一半，不能突然取消，所以这一轮房地产调控，地方政府坚决要保住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如果倒下会对地方政府有极大影响。我的判断是，经过此次下调，房地产业可能会有一次大调整。2018年“去杠杆”之后，我们的金融体系经历了一次大调整，如今的房地产行业恐怕也将经历这样一次阵痛。

文钊：我们改革的时候讲“摸着石头过河”，基本方式就是大胆尝试，摸索出一条大概的路径，成功之后得到政府认可，然后逐渐成为法律法规落实下来，再进一步推广；而这些年我们更强调“顶层设计”。是不是不同的发展阶段适合不同的制

度演进方式？

刘守英：改革开放以来，适应性的制度变革都是先由基层首创，在小范围内试用效果好，然后专家学者去考察论证，上层决策认可后再普遍化，最终法制化。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逻辑。

这个逻辑适用于正处于巨大变迁的社会。如果社会处于很稳态，大家基本知道将发生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能从顶层、用法治进行规范化。相反，如果这个社会并不是很成熟，处于剧烈变革和转型状态，很多变化不可预期，地方差异性也非常大，就要承认地方差异性和地方变化的动力，发挥地方的主观能动性，来寻找更可行的制度。所以我们整个改革的基本逻辑就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好的解决办法再变成政策。这是有道理的。

在我看来，首先，我们现在基本经济制度的定型很重要，定了之后就不要再在这方面继续“折腾”。但这不等于不改革，在制度实施中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完善，然后再往前走；其次，有些在战略上看好、看得准的东西需要把住，这样就可以避免试错的成本过大。

改革的早期阶段，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哪个方法好；但在目前阶段，基本制度的“四梁八柱”已经定了，我们不要再去动。在基本制度定型，有些看好的顶层设计的前提下，仍要重视地方的活力，不要放弃地方解决问题的这套经验。

姚洋：我非常赞同守英的看法。我们过去一直在摸索，现在恐怕要把一些制度固定下来。可能我们和其他很多人的观点不一样，因为社会上很多人说中国还是要改革。但是事实上，我们1990年代已经完成主要的改革，后来我们都是吃改革的红利。我们老谈“改革疲劳症”，那是因为我们现在该“立”了，而不是还要“破”。

“立”的根本性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定下来基本经济制度。现在看来，要想定下来，还有很多理论创新要做。为什么去年提出“共同富裕”之后会出现那么大的争议？因为我们对于基本经济制度还没有形成共识。有些观点走极端，说要回到1956年，但如果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够确定下来，就不会有这些误解。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解决就只能从顶层设计开始。因为理论不能是各自为政，然后拼在一起，而是要确定有一致性的理论，以替代原有理论。这件事的难度超过以往的任何改革。

文钊：您讲的理论是指哪一个层面的理论？

姚洋：我们讲的多种所有制并存，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共存，都是结论，都是“苗”，不是理论根基，因为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推不出这样的结论，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的结论悬在空中，但没有根。现在我们学者要做的，就是要把“苗”嫁接到“根”上去，这是我们的挑战。

经济学家的时代机遇和授人以渔的 经济学教与学之道⁴

林毅夫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在我的两本新书《解惑集》和《园丁集》出版之际，组织这场经济学学问之道暨“林毅夫讲习录”新书悦读会，让我有机会分享经济学家的时代机遇和授人以渔的教与学之道。

今天我主要分享经济学的教与学，内容对其他社会科学应该也有借鉴意义。

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我坚持这一论断已经27年。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邀请我写一篇祝贺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在那篇文章中我做了一个论断：21世纪全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在中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21世纪也会在中国辈出。当时，大部分人认为我这个论断是天方夜谭，因为当时现代经济学教育在中国刚起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发院前身）在前一年（1994年）成立，当时中国内地受过完整现代经济学教育的也就只有北大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那六位老师，而且当时世界知名的华裔经济学大概也不超过五个人。

当时我怎么给出这一论断？因为1994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同时，我和蔡昉、李周合著一本书《中国的奇迹》。在书中，我们做了一个预测：到2015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到203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低收入国家之一。而且当时国际上的普遍看法是中国有很多体制、结构问题，“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论断显得太乐观。但现在回头来看，1994年至今28年，我们的第一个预测早已实现。2014年时，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比我们原来的预测提早一年。到203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规模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会超过美国，基本上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机构的共识。

4. 本文根据林毅夫于2022年9月23日在承泽论坛第七期、北大博雅讲坛第480期——经济学的学问之道暨“林毅夫讲习录”新书悦读会上的演讲整理。

上面关于经济学研究中心和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论断高度相关。为什么中国经济学的教育才刚刚开始，我就认为21世纪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在中国，引领世界理论思潮的大师会在中国辈出？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不久，而且还有那么多问题时，我就论断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跟我研究问题的方法有关，我一般是从所观察到的现象探究其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

经济学是在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以后才从哲学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从1776年的亚当·斯密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包括马克思）。世界上其他地方不能说没有，但凤毛麟角。二战至今，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凤毛麟角。

为什么大师级经济学家的产生，会有时空的相对集中性？这个现象何以产生？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我们知道，实际上经济学的理论以及任何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理论用以解释现象，通过了解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构建一个简洁的因果逻辑，以解释现象，这个因果逻辑就是理论。

既然理论是一个很简单的因果逻辑，怎么判断一个理论是重要的理论，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我们没有办法比较逻辑本身的重要性或水平高低，因为能构成理论的逻辑都很简明，也往往能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理论或逻辑的重要性主要就决定于其所解释的现象本身的重要性。被解释的现象越重要，这一现象在世界上的影响越大，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就越重要。

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时，英国工业革命已开始，从经济上看，英国当时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对此怎么才能了解其本质。并且，

在众多社会经济变量中，怎么才能了解哪个变量是这个现象背后的根本决定因素？这时英国的经济学家就会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所以，当英国是世界经济中心时，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大多出自于英国，其他地方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一战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二战后，美国经济占到全世界将近一半，美国的经济现象就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在解释美国的经济现象时，美国的经济学家同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所以在这一阶段，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其他地方凤毛麟角。

既然在《中国的奇迹》这本书中我们预测，到2015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到203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也不过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按照《中国的奇迹》那本书里的逻辑，还会比美国快。到那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全世界最大，发展速度又比美国快，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也会最大。近年来，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将来至少维持在这一水平。自然，中国经济现象到时候就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现象。在解释中国现象时，同样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中国就会变成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应该会在中国辈出。

给学生上课时，我不断地强调这一观点。比如最近两三年我所教的新结构经济学本科生实验班的学生是20岁左右，博士生普遍25岁左右，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应该至少是美国的两倍左右，那时世界经济中心一定是在中国。所以作为老师，我当然要让学生知道他们的时代机遇是什么，希望我的学生能够抓住他们时代机遇，这是我作为老师的责任。



时代机遇永远在那个地方，能抓住机遇的总是少数人。例如，从 1776 年的亚当·斯密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凯恩斯，固然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来自英国，但并不是所有英国经济学家都是大师。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大师级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来自美国，也并不是所有美国经济学家都是大师。同样的情形，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变成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中国会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大师辈出之地，但也不是每个中国经济学家都会成为大师。我则希望我的许多学生会成为大师。

要使得我的上述愿望成真，就需要了解经济学大师与一般经济学家最大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经济学大师与一般经济学家最大的不同是，大师都是从他所处时代的经济现象出发去了解背后的道理，然后根据这个认识，形成一个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的因果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一个理论。解释的现象重要，理论就重要，提出重要理论的经济学家就成为大师。

我们知道实际的情形是在任何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做的工作主要还是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或是用数据来验证现有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更是这样，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

但是，如果当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时，中国经济学家仍然沿袭经济学界现在通常采用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或用中国数据来检验现有主流理论，这样的常规研究方法就会辜负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机遇。作为老师，我不仅有责任让学生了解所处时代的机遇，也要和学生交流切磋抓住时代机遇的方法。

首先，要抓住时代机遇，学生要学会从现象的观察开始，了解这个现象背后的道理和因果逻辑，不能看到一个现象就马上去找文献，看有什么理论可以解释此现象，这样很容易对号入座，而看不出表象相似的中国现象和现有理论所要解

释的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可能存在差异。

作为老师，我要教会学生从现象的观察出发来做研究，而不是从文献出发来做研究，而且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必须有一种“常无”的心态。也就是说，不能抱守现有理论，或现有模型、现有经验，必须用“初生婴儿的眼光”，以原原本本的、没有任何扭曲的、不戴任何有色眼镜的方式来直接观察、分析现象，推究成因，提出自己的解释。所有大师都是这样产生的，中国未来的大师也一定如此产生。要让学生明白，没有一个大师是根据文献、用过去的理论来解释现象而成为大师，这样做的经济学家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许会被称为“大师”，但对理论没有原创性贡献，在世界经济学殿堂中留不下痕迹。

学生如果要以“常无”的心态来观察现象，怎么观察？

在课堂上和各种场合，我都提出要回归亚当·斯密，但我不是指回归到《国富论》里的观点，比如市场很重要、分工很重要、市场中有“看不见的手”等等，而是回归到亚当·斯密的观察和研究方法。其实，亚当·斯密非常开诚布公地把他得出那些观点的方法直接作为书名。《国富论》是简称，书名的英文全称是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他整本书中的各种观点都是通过对他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本质”与“原因”（决定因素）的探索得出。我们常说，要教会学生钓鱼，不是给学生一条鱼。亚当·斯密书中的结论是亚当·斯密钓来的“鱼”，亚当·斯密“钓鱼”的方法则体现在书名之中。而且我们回顾一下经济学说史，亚当·斯密之后的大师级经济学家也都是运用亚当·斯密的方法去了解所处时代的重要问题、重要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以形成新理论，从而成为大师。一般的经济学家则是应用大师所提出的理论来解释他们观察到的现象或用数据来验证大师的理论。所以我们要教育学生回归到亚当·斯密的方法，观察所处时代的现象，自己揭示其本质和决定因素，这样才能抓住成为引领理论新思

潮的大师的时代机遇。

如果一名经济学家不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现象,有心以我的建议,以“常无”之心态,像亚当·斯密一样去了解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但又如何知道自己所提的解释就是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呢?在这方面,我有一些心得,归结为“一分析、三检验”和“三归纳、一分析”。

“一分析”是指先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本质,以及谁在做决策,决策时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可动员的资源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在可动员的资源和限制条件之下,有哪些可能的选择,最好选择的根本决定因素是什么,根本决定因素如何通过所得效应或相对价格效应产生了对最优选择的影响,据此提出对所观察现象的解释。

但怎么判断提出的解释中的决定因素真的是该现象的根本决定因素?这要靠“三检验”来确定。

一是历史纵向检验。这个决定因素在一个地方出现时,这个现象才在那个地方出现,这个决定因素未出现前,那个地方就不应该有这个现象。

二是当代横向检验。中国内地有31个省市,大部分现象都不是31个省市同时发生,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也不是一个现象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同时发生。如果提出的解释真的揭示了所要解释的现象的根本决定因素,那么,应该在有这个因素的国家或地区会有这个现象,没有这个因素的国家或地区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三是多现象综合检验。我们知道,真实世界的现象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像一团乱麻般地混在一起,如果提出的解释真的是揭示了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根本决定因素,那么这个决定因素会产生果,果又会变成其他现象的因,如此因因果果,一环套一环,根据这个根本决定因素所做的各种推论应该都能经得起实证的检验。

一名研究者对所观察到的现象提出的解释要

是经得起上述“三检验”,就能够有信心,这个解释确实揭示了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如果提出的解释与现有的某些理论一样,别人已经提出过,没关系,证明你跟提出这个理论的大师一样有洞察力,可以写一篇实证研究的文章来发表。但也很有可能提出的解释在现有的理论中没有,这个解释就成为创新性、开创性的理论,并且解释的现象如果很重要,就会成为一个有重大贡献的理论。

一位研究者如果观察现象时能够一眼就看出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就运用上述“一分析,三检验”的方法来从事研究。对于初学者可能没有这样的洞察现象的能力,则可以把过程倒过来,使用“三归纳,一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首先,了解这个现象什么时候才在被研究的地方出现,出现前与出现后在那个地方哪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在那些变化了的因素中哪个可能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这是历史纵向归纳。

其次,中国31个省市,世界有200多个国家,一个现象不会在所有省市、所有国家同时发生,要归纳有这个现象跟没有这个现象的地方有哪些不同因素,其中哪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是当代横向归纳。

最后,在发生这个现象的国家或地区,一定还有很多其他现象同时发生,它们应该都相关,从这些相关现象中去发现共同决定因素,这就是多现象综合归纳。

通过“三归纳”的方法会对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有所认识,根据这个认识再用“一分析”的方法,把谁是这个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资源可动员,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有什么可能的选择,所得效应和替代效应如何对决策者的最好选择产生了影响,据此形成解释这个现象的因果逻辑,然后再运用“三检验”把提出的解释重新检验一遍,以确保所提出的解释揭示了所要解释的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



一位经济学研究者如果能够将“一分析、三检验”或“三归纳、一分析”的研究方法运用得心应手,很有可能抓住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辈出的中心所带来的时代机遇。教会学生运用这些方法是当老师的职责,也是我在《本体与常无》、《解惑集》、《园丁集》、《切磋集》中反反复复和学生交流的。

但作为学生怎么学?我既然强调以“常无”的心态来看世界,是不是就代表不用学习现有理论?其实不是,而是要有正确的学习方法。

第一,作为学生,首先要努力学习现有的理论,但学习现有理论的时候要批判式学习,不是书上讲的都放诸四海而皆准,也不是在顶刊或者杂志上发表的都是揭示了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理论。其实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只在给定条件下成立。所以,在学习时要用“一分析、三检验”的方法,根据自己所知的中外各种经验事实来检验读到的理论,进行批判式的学习。

一个理论在提出时可能确实经得起当时经验事实的“三检验”,但时代改变以后,关键决定因素可能变了,原来可以不保留在理论模型里面的那些被认为不重要的变量,可能变得重要了,量变已经形成质变;原来认为重要的变量,则可能变得不重要了。所以我们读西方经济思想史,例如宏观理论,凯恩斯的理论是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提出,当时是能解释现象、能够改变世界的理论,但到1960、70年代以后,失掉解释力,被芝加哥大学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取代。主要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的前提是存在大量过剩产能。到1960年代,过剩产能消失,积极财政政策增加了需求,而产能和供给增加得不那么快,就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只产生通货膨胀。时代在变,所以我们在学习理论时,需要批判式思维,仔细了解一个理论适用的前提和暗含前提。

在发展中国家学习现有理论时更需要批判式思维。我们现在读的理论,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基本上是解释发生在英国的现象。二战至今的理

论基本上是解释发生在美国的现象。在产生这些理论的国家,条件改变,理论就要变。把这些理论直接拿到中国来是否能适用?不能说绝对不行,但不适用的概率很高。所以就要用“三检验”的方式来检验。例如,我在课上常讲,“经济要发展,技术必须不断创新”,这是对的。但是技术创新的内涵是在下期生产时所用的技术比现有的技术好。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位居世界最前沿,要创新,就必须自己发明。但发展中国家用的技术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只要你引进消化吸收就是创新。发展中国家要创新,就要衡量自主发明和技术引进哪一个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具有后来者优势,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对发展中国家更好。所以,我们要用批判的方式学习,尽信书不如无书,一个学者的研究如果从已有的理论、观点、结论出发,那就不能做到“常无”。

第二,要了解学习现有理论的目的和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我在《园丁集》和《本体与常无》两本书里反复讲,学习现有理论的目的不是应用这些理论,而是应该像画家临摹名画,去学会怎么画出一幅好画。参观巴黎卢浮宫等世界著名的博物馆时,我们经常看到有画家在那里临摹名画,据说一临摹就是3个月、半年。张大千当年到敦煌临摹唐朝壁画,一临摹也是半年、一年。他们是为了画得像吗?不是。临摹名画的本意不是为了画得像,而是揣摩。我们知道一幅好的画,事后分析,基本上都能够符合构成一幅好画所必须达到的基本条件。绘画大师如何用那些基本条件来反映自己内心对世界的感受,并且画出来以后引起世人的共鸣,这是值得揣摩的。

我们在学习经济学理论时,基本也要这样。经济学理论的组成因素很简单,任何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现象时,总是以一个理性的决策者,通过所得(预算)效应和(或)替代(相对价格)效应这两个机制在他可动员的资源 and 不可逾越的约束条件所共同决定的可选方案中选出他认为最好的方案。真实世界的现象错综复杂,经济学大

师怎么能归纳成所得效应和替代效应那么简单的机制来解释呢？这是我们在学习理论的时候要去用心揣摩的。

在这种揣摩过程中，慢慢地学会像大师那样观察世界，抓住现象的本质，发现它的根本决定因素，然后用经济学家所用的所得效应、相对价格效应的语言把一个理性的决策者的选择认识构建成理论模型，提出经得起“三检验”的解释。在巴黎卢浮宫临摹名画的那些画家是在揣摩如何通过参透名画背后的机理，画出属于自己的新的名画。想成为大师级经济学的学生，也应该揣摩现有理论背后的机理，提出既属于自己，又对重要现象有足够解释力的新理论。

上述学习方法是新的方法，而且比现在大家惯用的以记知识点为目标的学习方法难。

但是，在中国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学者们做研究还是习惯于拿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自己国家的现象，用自己国家的数据来检验现有的理论。这样的文章写出来以后杂志的编辑和评审人看得懂，也容易接受、发表。

这里就需要弄清楚我们学习理论或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学习理论或者是做研究，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我们要能够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但更重要的是，能通过这种认识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学习理论的目的，也是我们做研究的目的。

一个现象如果可以用一个理论解释，通常也可以用很多个理论来解释。但是，只有揭示了在我们的国家所出现的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的理论，才能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在众多可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的理论中应该只有一个真正抓住了所观察现象的本质和决定因素。所以，我们在学习和做研究时不要满足于所学的理论能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或所写的论文能发表，要追求的是按照这样的理论去实践能够实现改造世界的目标。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知成一体”的原因。而且，也只有以此存心才有可能抓住提出

新的理论的时代机遇。

在此我想再多说一点，如果在面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现象时所用、所发表、所倡导的不是真正揭示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的理论，不仅个人会丧失理论创新的时代机遇，还很可能会误导社会。

以俄罗斯的转型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之所以采用休克疗法转型，是因为1980年代其经济学界普遍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不行是因为产权国有，政府干预太多，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寻租腐败，要改善经济就必须以休克疗法来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写了大量文章去宣扬上述观点，形成了社会共识。当时国外的经济学界还有一个共识是中国的渐进双轨制改革会形成比计划经济更糟糕的制度安排。这样的观点由大师级经济学家提出，写成理论模型，发表在顶级期刊上，在当时也形成了共识。2019年在莫斯科大学举办了一个苏东转型30年、中国转型40年的国际研讨会，在俄罗斯倡导并推行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格拉杰夫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他说回头来看，中国的渐进转型才是对的。所以，一个学者要是不能真正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本质，认识到这个现象的根本决定因素，不仅很可能会失掉提出理论创新的机遇，而且也可能误导时代。

最后，要了解所处时代的现象的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一定要关心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必须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情怀。只有这种关心才能不断积累真实世界的知识，才有动力和能力去应用我前面讲的“一分析、三检验”或者“三归纳、一分析”的方法。如果对历史纵向、当代横向、社会的很多现象没有了解，怎么能运用这些真实世界的知识来检验、归纳？所以，要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一定要平时就有对所处国家、社会、世界充满关怀。

最近我写下一篇《七十感言》。我常言自己



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第六代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的国家从文明鼎盛的大国变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半殖民地国家。为了民族复兴，历代知识分子做了很多努力，从推动洋务运动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第一代知识分子，推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还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第二代知识分子，推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第三代知识分子，五四运动进入大学、毕业后参加北伐、抗日战争、社会主义革命的第四代知识分子，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进入大学、毕业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五代知识分子，他们都做出了无愧于后人的努力。但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下滑，他们都不能像我们今天一样有底气说世界经济中心会在中国，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会在中国，引领世界理论思潮的经济学大师、社会科学大师会在中国辈出。作为第六代知识分子，我感觉很幸运，在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我认为我

教的学生作为第七代知识分子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幸运，因为在你们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黄金年华，民族复兴会在你们这代人身上实现，世界经济中心会转移到中国。

我们也知道，“行百里者半九十”，虽然中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前路的挑战也会更多，要解决这些挑战，就必须有理论指导，而且这样的理论绝对不是源自现有发达国家的理论，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从收入水平刚刚中等、经济总量却跃居世界第一，又发展最快的超大经济体，各种条件都和产生现有理论的发达国家不同。这就需要第七代知识分子本着“常无”的心态，用“一分析、三检验”或“三归纳、一分析”的方法来了解你们所处时代的现象的本质、根本决定因素和关键作用机制，提出能够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这样中国经济才能乘风破浪不断前进。如果你们能够提出这样的理论，你们将不仅助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也将成为引领时代新思潮的经济学大师。

细处求精 宽处谋局⁵

周其仁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

能螺旋式上升就很了不起

今年调研的第一点感受，在严峻的环境里图存。制造业生态中有“草灌乔”企业。其中“小草”企业体量很小，实力很弱，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弱，怎么渡过当前这个环境？

今年5月，我们去佛山张槎调研。这里的主导产业——针织产业是传统行业、劳动密集行业，也是佛山制造起家的行业之一。我们去看时，企业开工率只有20%—30%。我们敲开企业门的时候，有些老板正在打瞌睡。我问为什么不回家睡？他说万一来订单呢？我问，工人呢？他说，工人都回去了。工人不在，来订单了怎么办？企业表示，事先会定期给工人发几十块钱，买一个额度，这个额度可以让他们一旦有订单就马上回来做工。这样的场景你走过一趟就不会忘记。在加工这个行业，很多企业的货卖不出去，所以也拿不到钱。我们看了很多企业，并看到周边有很多帮企业搬家、帮企业转手的广告。这是严峻的现实。

产业界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原则》，它讲了一个道理，是螺旋上升。什么叫螺旋上升？企业有了一个目标、一个布局，趁着一个势头，就冲上去了；但是可能遇到挫折，碰见一个弯又被“打”回来了。当宏观形势、产业趋势、区域形势发生重大逆转的时候，还真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冲上去，能螺旋上升已经很了不起。

我们在张槎发现，很多公司创业的时候不是没有理想、愿景，也不是没有过辉煌，而是当大势往下走的时候，他们就自由落体般地消失了。但是其中会有一些企业在往下落的时候又扭头赶上来。这个“扭头”靠的就是总结、提炼。

活下去不光要有意志，还要有方法

活下去并不是光有意志就行，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要有一套方法。把它总结好以后，企业要确立新的更大的目标，然后再往下打。

我们都知道日本精益生产方式。当年日本凭借精益生产在竞争中刺激了美国，打败了美国的很多企业。后来美国企业把精益拿过来消化、提炼、改造，形成了美国式的一套精益办法——丹纳赫模式。佛山民营企业公牛就把丹纳赫模式“拿”过来，不只欣赏，还系统地、全面地用。例如，公牛推行的丹纳赫精益模式如何定义车间里的浪费？不是从自己的角度判断，而要站在客户的角度看工厂有没有浪费。凡是客户不愿意花钱买的那部分消耗就是浪费，都要想办法把这个浪费从生产过程、经营过程、投资过程、研发过程中挤掉。这就是以客户为中心。

制造业最大的潜在力量在哪里？就在自己的

5. 本文根据周其仁于2022年9月27日在“2022佛山市企业家日品质革命大会”上的分享整理。



车间里，就在自己的公司里，因为很多浪费当成为习惯以后你就觉得不是浪费了，这是因为你还在用传统农业的观念来看今天的制造。在传统的农业观念里，一切都是自然的，人对很多事情无能为力；而在制造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观念里，一切都有办法，每个环节都有办法，每个东西都可以改善。

丹纳赫模式的提炼者——丹纳赫这家美国公司就是用这一套办法先改善一家工厂，成功后接着再改善另一家工厂，最后一路“杀”下来。靠着这个模式，丹纳赫收购了六七百家公司。被收购以后，这些公司提升了毛利率，降低了不良率，提高了交货率——这三个“率”就是钱、就是利润。最后把它放到资本市场，以20年为期，丹纳赫投资的制造业公司股价连续上升，比巴菲特投资的项目还要好一些。

只要活着，就要练精益的功夫

更重要的是，丹纳赫不仅仅有理念，还摸索出了一套工具，将精益变成可操作的东西。它的工具箱里有一百多项工具，每个问题怎么解决，都能找到相应工具。

丹纳赫还把丰田生产线的精益扩展到整个经营流程，甚至做研发都有精益。流行的观念认为研发经费占销售额的比重越大越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往研发领域放资源，统计上总是会给公司带来长远收益。但是实际研发过程中很多开支是看不见的。怎么把研发当中消费者不愿意花费的资源省下来，怎么把研发作为一个项目、作为一个流程去挤里头的水？怎么把精益从研发进一步扩大到后勤、总务、配车等各个环节？这方面的调研发现是很大的收获。

美的也在推行丹纳赫式精益。现在美的培养出了很多精益化工程师，他们进了工厂就能挑出毛病，知道一个礼拜怎么改、一个月怎么改、一年怎么改、一轮一轮怎么改。这就把我们习以为

常的、在我们手里就可以做、可以决策、可以行动、可以对付逆境的最重要武器拣起来了。

美的、公牛等大企业可以请高端咨询机构来辅导精益化改造，但小公司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打造佛山的“场”效应，产业服务、工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做起来，这从长远来看会带来重要回报。比如公牛、美的都培养出了一批精益工程师，他们的外溢经验可以渗透到“草灌乔”企业里，“乔木”企业的经验可以帮助“灌木”企业，“灌木”企业的经验可以帮助“小草”企业，然后地方政府、产业协会都可以在里面发力。如果佛山对这个概念特别入心入脑，并将概念变成行动，那在同样的下行因素叠加下，佛山活下来的公司就会多一点。

练精益化这套功夫不分好时候、坏时候，只要你活着，就要天天练、全员练。一直练，就增加了对付意外冲击的存活率。很多疾病是日常生活习惯养成的，我们工业是很有希望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工业粗放的问题。只要还活着，你就练精简的功夫，增加我们的抗风险能力。

善阵者不战

第二点分享是，善阵者不战。阵布好了，不打也赢了。

首先是企业布局。我们在调研当中发现，很多公司虽然面临严峻形势，但还能接待我们、介绍经验，那其一定有过人之处。过人之处从哪里来？是他们以前做决策的结果。我的结论就是，布局非常重要。广义来讲，布局是资源的布局，但还要加一点——时空。你今天做什么、以后做什么、5年后做什么？今天谁是你的客户，以后谁是你的客户，5年、10年后谁是你的客户？这些事情是要谋的。

科达制造董事长边程介绍的经验就是布局。他说，不能老在国内这么“杀下去”，否则利润为零。利润为零对消费者最好，但是企业怎么往

前发展、怎么研发、怎么投入？所以要开拓出去。科达是做机器的，怎么往外头打？先是找合作伙伴——广州森大贸易公司。森大发现几年前非洲市场已经发展起来了，非洲有十三四亿人，一年进口瓷砖 10 亿美元。非洲不会生产，但是有需求。然后森大找到了科达，他们达成的合作模式是：科达提供设备，森大了解市场，双方合作在非洲建陶瓷厂，一起到非洲市场赚钱。这是科达好几年前布的一个局、落的一个子，今天有了收获。

厉害的企业都对趋势很敏感

我们还调研了一家公司叫哈士奇，做冰箱的，它的产品很有活力。企业创始人是丹麦人，最早落在了北欧芬兰，这里是高端市场，讲品质、讲品位。老板把业务做起来后，开始全球布局，2009 年在顺德落厂。为什么？因为亚洲在崛起。当时中国工人工资比欧洲工人低，而且中国人开始有制造能力了，所以这家企业来了。来了发现更大的变化——中国有市场。这种冰箱原来都是利用中国的“工资洼地”造，造好后再以每个 500 欧元的价格卖到欧洲。后来发现中国市场也开始有苗头了，而且企业打入中国市场不能沿用原来的设计美学，而是要把产品做出变化。所以这家企业开始在亚洲建立团队，将东西方美学进行融合。再过几年，老板要退休了，儿女不肯接管企业，最后让企业的中国员工接手，股权转让了过来。现在这家公司的老板是中国人，2000 年从北航毕业，表现优异，深得原来老板的信任。这就是企业家的胸怀，有了机会就接过来。这个布局就很有意思，从北欧制造开始，最后打入中国市场。

再看我们调研的另一家企业东方精工。这家瓦楞设备生产企业在 3 亿元销售额规模的时候，就敢收购意大利一个 10 亿元销售额的公司，成功后就变成了行业内全球第二大企业；行业第一大企业是德国的，第三大企业是美国的。2009 年前后，这家企业又收购了苏州企业百盛，做船

外机，也是精工。为什么从瓦楞制造跳到了船外机领域？这取决于做局，做局就要看势。

东方精工以前是 To B 的企业，但是这块需求有降低趋势。大趋势大周期有时候对工业制造打击特别大。那我能不能布局做一个 To C 的产业？这个产业在管理、工艺上和我以前的业务有共通性——造设备和造船外机有相同之处，都是精密制造，所以东方精工收购了这家企业，对整个企业特别是这两年起到了很大作用。

厉害的企业家就是看得远一点，对趋势性的东西很敏感，早警觉，早构想，早落子，一年一年走下去，最后就能看到布局的成果。

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最大的好处是拓宽了我们的视野。美的创始人何享健说：“不与同行争天下。”“天下”是什么？以前很多老板以为天下就是本国，其实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我们调研的万和也是这样。以前东北哪有打开水龙头就能洗热水澡一说？那是巨大的享受。这种情况下，热水器怎么会不受欢迎？中国人民从低收入往上走时，这种产品哪家不要？但是后来这个产品普及了，就开始追兵四起，蓝海就变成红海一片，怎么再往前打？万和董事长讲，中国造热水器已经没问题了，但和欧洲品牌有差距。贴欧洲的牌和不贴欧洲牌，一台热水器价格相差 1000 元。你怎么让人家也相信中国企业的品质？万和就跟德国公司合作，升到德国市场去。万和还和德国客户讨论，俄乌战争后，欧洲天然气价格高涨，带来的后果是无数替代会起来。中国所有电器设备进欧洲会形成一个峰值，因为欧洲需要更省能源的、替代能源的产品，万和如果据此布局，可以创造更多机会。

还有一家调研对象企业是乐普达。这家公司不大，但是势头非常好，原来是给美的供货的，



做电机，后来给整个家电行业供货。但是房地产行业起伏会影响企业。乐普达就发现，自己的电机技术虽然做的是小产品，但是不光空调离不开，汽车也离不开，所以就往汽车行业、新能源行业转。这就是布局，不只看今天，还要看未来。

愿景不是布局，布局是关于怎么实现愿景。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愿景，都有雄心壮志，怎么做到？资源怎么放？往哪儿放？往哪个产品放？往哪个行业放？争取让谁做你的客户？这就是局。布局不只是思维，更要落子，因为落了子才知道前后左右相应的变化；这是商业竞争，不是靠意念就能完成的。

善用互联网思维“做局”

伊之密这家企业，我们去调研过好几回，印象非常深刻。今年再去的时候，企业已经是全新的架构。我们请教伊之密，在目前的冲击下，企业如何解决供应链的问题。伊之密介绍，公司一年的零配件采购额大约是23亿，其中有3.5亿属于海外采购。企业采购大概占销售额的百分之五六十，这是现代制造业的一个特点。现在在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世界来来往往的秩序在发生变化。这个时候，企业怎样才能管理好供应链、做好采购呢？在市场竞争面前，哭没有用，大变局不相信眼泪。

那要怎样对付呢？多买一点东西存起来吗？但是企业的财务承担不起风险。所以更大的应对本事是，企业要主动去寻找替代。要买一样东西，永远可以买得到，世界大着呢。如果因为技术上的某个约束条件，导致这个产品不能被替代，那就换一个约束条件，这样产品就可以被替代。企业要把替代的问题要提上日程。

我以前说过这个观点，前几年业界都在说互联网思维，到底什么叫互联网思维？当年研发互联网的人，就是要建立一个分布式系统，想要实现的是——这一段被打掉了，迅速连上那一段，

那一段被打掉了，再迅速联上另一段，永远打不烂。这是当初设计互联网的思想，没想到引发了一场互联网的技术革命。

我们今天做普通业务，不是做互联网，但也应该如此——东方不亮西方亮。问题是要把这套理念用到产业里，用到零部件、采购商、供应链里面。伊之密给我们介绍的就是这样一套本事。为什么要全球布局，有伊之密美国公司、伊之密德国公司、伊之密印度公司？这都是为了应对供应链危机。

拓斯达的老总是学徒出身，所以他对人力资本非常敏感。公司专门学习了华为分享股权的做法，团队成员都可以分享股权。他的思路主要是两个：第一是他在十多年时间里和大量公司接触后发现，企业迟早有一天一定要用机器人，机器人不怕疲劳、做事准确、成本低，总有一天机器人会替代人；第二，他认为工业的底层基础技术就是那几样，这些最基本的技术可以组合成各种各样的产品，这些产品又被用在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他利用这种布局思路，所以成长得特别快，企业发展势头非常好。现在拓斯达上市十年，销售额已经翻了10倍，从4亿元升到了40亿元。这就是思路决定出路。

大跨度布局应对不确定性

企业为什么要出海？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经验就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早年，中国制造业很多东西不会造，就是通过不断开放，引进来的。瑞士钟表是如何从瑞士造，到香港造，又如何从香港转移到东莞造的？我们要不断追问这个问题。

再往前追溯，钟表为什么不是由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生产呢？科达边程一句话点破了原因——先行的国家造出来的产品太贵，消费者买不起。这种情况下，开拓市场就会遇到问题。比如我买不起瓷砖，不等于我不用瓷砖，我买不起瓷砖，我可以先用水泥地来替代。工业的逻辑也

是这样,我的要素成本比你的便宜,那就我来生产。这个逻辑的演绎,不会到了中国就停止。

今年,我还去调研了一家长三角的企业,叫申洲国际,做针织服装。申洲国际为全世界最好的服装品牌供货,目前在越南也有布局。申洲国际为什么会去越南?无论是董事长,还是其在越南的负责人,给我的回答都是一致的——因为客户而走出去。如果要继续和某个客户合作,企业就必须出去外面设厂,因为这是客户的要求。申洲国际的客户都是全球大企业,这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结论,要求供应商也跟着走出去。申洲国际这么多年来都是跟着行业里最好的客户发展,客户带着他们一关一关地闯过去。

早在2000年左右,申洲国际就开始伸出触角,2014年在越南设立了工厂。回过头来看,这个布局对企业帮了大忙。因为去年,申洲国际的宁波工厂出现了一例新冠阳性,工厂因此关停了15天。作为全球品牌服装的供货商,最重要的就是做到按时交货,当时出现这个情况后,幸亏申洲国际在越南有工厂,可以应对交货问题。

大跨度布局是我们应对时代不确定性的关键一招,因为即使有很多危险,也不会同时发生在跨度很大的不同地方。如果你的布局跨度很小,就很容易被一网打尽,跨度大则可以增加生存的机会。

走出去要落地生根

企业去到一个地方就要落地生根,不要淘完金就走。申洲国际越南工厂的食堂里摆满了几千个榻榻米,是给工人午休用的,当地工人非常感激。越南工厂的周总告诉我,越南工人非常爱干净,从来不需要派专人打扫这里,也从来没有丢过任何东西。每一年,申洲国际还安排一天让越南工人可以带着家属来参观工厂。这种理念就是,来了当地后,就跟着这个国家成长,去培养尽可能多的当地人。

走出去当然也会遇到困难。美的很早就开始在越南布局,在当地生产电饭煲、电风扇等,再从这里销往欧美市场。2014年,越南当地发生过一次暴动。美的的员工提到了当时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在那场暴动中,他们躲起来了,是越南的一位保洁工掩护了他们。美的后来就吸取教训,不要去到哪里都打出中国元素,现在去到当地的工业园,发现全部都是越南文和英文。

走到哪里都要和当地人结合在一起,这是最优策略。科达董事长边程说,帮助他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如果一个地方的人没有购买力,当地的市场怎么会“厚”起来。

什么叫内卷?内卷就是生产在增长,需求不增长。如果中国还停留在仅仅搞传统农业的话,我们能买得起几块瓷砖?几个冰箱?几个热水器?这个逻辑对于全人类都是一致的。我们今天能出海,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有40多年工业化高速增长的经历。

工业出海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便宜的劳动力不会自动变成工业品,还需要加上企业家、技术、管理,这些元素都来了以后,才能把本地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劳动力变成现代制造劳动力。

佛山的产品,是跟着中国人民从低收入开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佛山很多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不等于在全世界这些行业都是产能过剩。企业到海外去布局,也是先让当地人从传统农业工人变成工人,工人有收入了,就会有消费需求。家里是泥地的人谁不想用上水泥地?有了水泥地谁不想铺瓷砖?有了瓷砖谁不想有唯美的装饰?需求是被激活的。让更多当地人进入高生产率的部门,挣到更多的钱,改善生活后,把当地市场变成更宽阔的市场,这反过来也是给我们过剩的产能找到一个落地的机会。如果把消费者从传统农业工人变成制造业工人,前景是巨大的。

这次我在越南看了好几家工厂,看完真的很高兴。有两家越南的工厂是佛山来的卫浴企业,他们都是通过代工的方式把产品卖到美国市场,



后来他们又发现，越南市场本身也不小。为什么这些越南工厂一贴招工启事，门口就排起长队呢？我去到后发现，有很多工作的收入是比工人收入低的。我们要怎样开拓这里的市场？那就是让这些人都从事更效率的工业生产，提升购买力，这样我们整个制造业就能更好地前进。

“练精益化”与“谋布局”

企业接下来要苦撑苦熬是必须的，但是要加一个“+”，加什么？如果工厂还开着，就练精益化，站在客户的角度减少浪费。这是永远都有得做的，

你会发现问题不是一轮可以解决的，你还可以发明新的工具，解决新的问题，一轮一轮地做精益化。从以客户为中心的层面出发去做精益化，从这个出发点开始，增加公司的存活几率。

抱团取暖也很重要，但也要加“+”，特别是企业里面关键的少数人。全员要去练精益化，但关键的少数人要练布局，要谋布局，看得更远一点，更广一点。

企业之间也要互相学习，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学习布局能力。

总的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一是要在细中求精，二是要到宽处去谋布局。

中国经济的韧性⁶

姚洋

北大国发院院长、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院长

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韧性”，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看法，然后也分享我对短期挑战的理解和应对建议。讲这个主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中国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大，但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做创新的企业，一定要有长远眼光。

一、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韧性

创新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我一直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态势抱有信心。我们的经济虽然短期挑战巨大，但我相信，这些挑战可以克服。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里呈现出十年为期的周期性变化，所以，经济有起落是正常现象，不要把短期变化当作长期趋势。

1980年代是增长比较快的时期，农村改革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当然，速度快的原因也和当时的基础较薄弱、起点低有关。

1990年代是调整期，我们进行了城市改革，包括那些奠定中国经济基础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分税制、加入世贸组织等，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今天回望过去，北京的变化就很典型。北京

的主要变化发生在上世纪80、90年代这二十年。例如，我们现在所在的中关村，二十年前很多地方还是稻田。很多人印象中四环建成很多年，其实开通于2002年，并不久远。80、9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的基础。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实现超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加入WTO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出口从2001到2008年短短七年增长5倍，速度极快。现在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财富实际上都积累于那十年。

2010年以来的这十年又是一个调整期。但和1990年代的调整不同，1990年代主要是搞改革，过去这十年主要是调经济结构。

我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事情，不能总是旧事重提。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研究中国经济多年，在我看来，我们绝大多数改革在1990年代都已经完成，现在提出的所谓“改革”其实本质是“经济政策”，因为改革是要动制度。

过去十年有个非常大的转变，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创新驱动。本世纪头十年，基本上中国生产什么产品都能卖出去，因为国际市场几乎无限大，国内市场也在增长；但过去十年的情况有变，政府在推动去产能、去杠杆，企业自己也在转变。过去十年成长起来的大企业多为高科技企业，不少传统企业过去十年也转向硬科技。

6. 本文根据姚洋于2022年9月13日在北大国发院公开课暨中关村创新合伙人-独角兽企业党建与发展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以前总说我们的企业没有掌握行业标准，因此被外国“欺负”。我们怎么去掌握标准？不是自己想去制定一个国际标准，那个标准就为你所用。只有自己强大，在世界上成为行业“领头羊”才能让其他国家遵循你的标准。

过去十年，隐形冠军企业不断涌现，工信部刚刚公布了 546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我看来是有指标意义的，这样的硬科技、实业应该提倡做。当然，并不是一定要做芯片这样最高精尖的科技，只要你在自己的行业里做得最好，就能够成为一个高新企业，并努力在一些领域内领先世界。

我国已经有一些领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比如 AI 技术、新能源、电动汽车等。中国的新能源对于全世界拥有碾压式的优势，风电和太阳能的装机容量占世界的一半，而且新装机容量基本上一半也在中国。电动汽车是一个新兴产业，中国也领先世界，稍后我会给大家看更多数据。

很多人担心，中国的制造业开始外流，竞争力减弱，“世界工厂”的地位要被东南亚取代。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起码在我有生之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不可能被取代。

	2010	2020
中国大陆	18.24	29.19
美国	16.96	17.19
日本	11.26	7.05
德国	6.35	5.14
韩国	2.98	3.08
印度	2.71	2.58
意大利	2.88	2.12
法国	2.59	1.83
英国	2.24	1.72
中国台湾	1.23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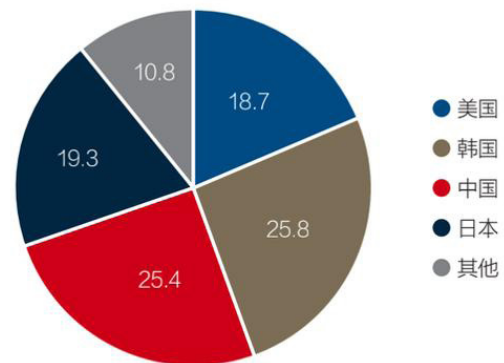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https://data.gotohui.com/list/161693.html>

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前十国家 / 地区
占世界比例 (%)

如上图，2010 年到 2020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例增长 11 个百分点，2020 年的增加值相当于排在我们后面的美国、日本、德国三国总和。从上图也可看出，美国并没有衰落，因为美国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还在进步。美国只是相对于中国在衰落，因为中国跑得太快，美国仍然比绝大多数国家跑得快。日本、德国在下降，特别是日本衰落得厉害，韩国在上升，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比例不升反降，意大利、法国、英国都在下降，中国台湾还在上升，而越南根本排不进前十。

事实上，我们的产业向越南转移之后对中国有利，我们给越南大规模出口的是中间产品，回头再买东南亚生产的衣服鞋帽，说明我们的产业已经升级。

图1: iPhone X的增加值
(按国别分布, 仅生产阶段)



iPhone X货值: 409.25美元
中国贡献: 104美元, 占全部货物清单值的25.4%

资料来源: 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海外院长邢予青供图
制图: 颜斌

上图是 2020 年 iPhone 的增加值数据，有标志性含义。2010 年中国在 iPhone 增加值的份额里只占 3.6%，到 2020 年我们已经占到 1/4，仅次于韩国，假以时日肯定要超过韩国。而其他一些国家厂商的份额在下降。

我国出口产品里的附加值越来越高。起初，

出口加工业的附加值为负，现在稳定在百分之三四十以上。也不要小看小型企业，一家拉链厂的附加值也可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也可以很赚钱，我们没有必要说哪些行业绝对差，哪些行业就绝对好。

中国与世界的连接还在加强

事实上，中国非但没有跟世界脱钩，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反而在增加。大家要记住这一点，不要盲目相信网上一些言论，应该看事实和数据。数据告诉我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刚开始有作用，中国也做出了调整，但疫情之后，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不断回升，没有下降。中国贸易额在疫情之前只占世界的11%，现在达到14%，与主要国家的贸易额从14%增长到17%。

很多人担心俄乌冲突带来的影响，但我并没有看到冲突对中国有多大的影响。中国采取了一种有原则的中立态度，从道义上完全正确，对经济现实也有益。欧洲想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只能多挖煤，但挖煤不可持续，因为气候变化是欧洲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下一步必须多用太阳能、风能。设备从哪来？中国。中国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的技术经过二十年的摸爬滚打和几轮淘汰，已经掌握了核心技术。今年一季度，欧洲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增长一倍，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优势。

美国总想和中国脱钩，实现了吗？2020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稳步上升，2020年是3103亿美元，2021年是3553亿美元，今年前7个月就已达2427亿美元，根本没有下降的迹象。

美国的措施中唯一可能对中国有影响的就是科技脱钩。实体清单、CHIPS、CHIP4都对中国有影响，但其影响也不必夸大。

首先，美国的企业不支持脱钩，它们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美国商务部90%的对华贸易禁令最后都被违反，因为禁令不是不允许给中国出

口商品，而是要求企业去申请，最后90%的申请都获得批准。这就是美国企业起的作用。美国企业并不受美国政府左右。

我的看法是，如果拜登政府继续沿用对美国企业不利的策略，到2024年美国大选时，民主党连任的可能性很低，共和党很有可能当选。共和党坚持市场第一，所以如果共和党执政可能会推翻现有做法，美国对华态度应该会有所改变。

当然，我们不能期待美国取消这些封锁，但是我们也在做调查，特别是调查实体清单上的企业。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注重数据。数据显示，美国的贸易封锁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由于不能使用5纳米的芯片，华为的确不能做最高端的手机，但小米可以做，所以这两年小米手机大发展。实体清单上其他一些企业也有同样的情况。而且美国的做法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已经具备了自己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

如何推动科技创新？我认为没有什么秘密，最根本的两个因素：一个是人才，一个是资金。中国不缺人才，我们的资金也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有人问，中国这么多人，为什么还是赶不上发达国家？原因就是资金还不够。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声称，即使他把如何做7纳米芯片的技术告诉大陆，大陆也做不出来。为什么他敢这么说？很简单，大陆在芯片制造方面的投资和技术积累还不够。现在，中国至少在某些关键领域里敢投钱，也有民钱，所以美国想卡住我们的难度非常大。

而且科学知识无国界。在美苏冷战最高峰时，两国科学知识的互享都没有停止。美国的隐形战机是怎么研制出来的？是一名美国工程师在一本不起眼的数学杂志上读了一位苏联科学家写的论文，从而得到启发。我相信，今天更是这样，学术交流和知识互享不会中断。

总之，我们不能把问题夸大，要理性求实。

中国有些产业已经开始领跑全球

新能源汽车从2021年开始起飞，当然这跟



特斯拉的“鲶鱼效应”很有关系。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354.5 万辆，占世界的近 60%，是美国的六倍。今年我们延续了高速增长态势，1-6 月国内零售 226 万辆，同比增长 123%。

最典型的的就是比亚迪，这家曾经在国内都不主流的车企，现在已成为全球市值第三的汽车厂家，非常了不起。比亚迪电动汽车的销量在今年 1-5 月份有近 50 万辆，而且其销量同比增速也很高。

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非常快，2020 年出口 22.3 万辆，2021 年是 58.8 万辆，2022 年 1-3 月已达到 20 万辆。如果以今年一季度的速度来增长，今年大概能出口 80 万辆，比去年又要增长百分之五六十，甚至更多。中国的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已达 10%。

中国的燃油汽车在世界其他国家的份额几乎为 0，但我们的电动汽车为什么有这样的优势？两方面原因：一个是电池，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动力电池厂家有六家是中国的，占全世界产量的 56.6%，形成碾压式优势；另一个就是中国的 AI 技术、互联网技术，这两个技术结合后在新能源汽车上形成大量的应用，革新了汽车赛道。

所以我认为，中国重复日本汽车在 1980 年代走过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将继续大规模地出口世界，这已经是大势所趋。

顺便说一点，中国的经济并不特殊，跟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比较一下就发现，我们基本上在重复他们曾经的发展道路。比如，我们跟日本有可比性。日本在 1973 年之前的二十年走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1973 年石油危机迫使日本转型，从此走上创新发展之路。上世纪 70、80 年代，世界上绝大多数知名的科技创新都来自日本，日本的汽车也打败了美国汽车，美国的车企不得不靠国家救助才没有倒闭。那么，中国这一轮电动汽车起飞之后，下一个和我们冲突的国家将不是美国，而是德国，因为我们大概会挤占德国汽车很大的份额。欧洲已经决定到 2035 年要禁售所

有燃油汽车，奔驰、宝马、大众这些德国车企将面临来自中国的巨大竞争压力。上世纪 70、80 年代是日本的黄金二十年，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未来的二十年到三十年也可能成为中国的黄金二十年或黄金三十年。

我曾讲过，未来三十年是中国千年以来最好的三十年。千年以前，中国在北宋时期达到世界农耕文明的巅峰，在那之后中国发展停滞，然后衰退，直到 1949 年我们才开始了追赶。那么，在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之前的这三十年，应该会是我们追赶路上又一个黄金三十年。投资中国，在中国发力，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二、中国经济的短期挑战和展望

虽然中国经济已经具备长期创新增长的韧性，但一切都还需要从短期做起。中国短期的挑战有哪些？如何应对？

上半年经济回顾

短期来看，我国经济的确遇到一些难题。上半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和制造业 PMI 波动较大，复苏很不稳定。消费受到的冲击非常大，和疫情的反复有关。投资比较疲软，今年一季度本来表现较好，但后来疫情反复，投资增速又下降。下跌最严重的是房地产，一直负增长。

物价方面我并不是担心，中国不可能有通胀压力。如果有，也都是输入型通胀。现在看来 PPI 的最高峰已经过去，如果说要有通货膨胀，去年就应该发生，但并没有发生。CPI 的波动主要来自于食品，其中猪肉占的比重非常大。猪肉有其周期，现在看来猪肉价格的上升周期到来。我希望我们的 CPI 能高一点，因为升高就说明国内需求有所复苏，企业开工充足。现在的大问题是需求疲软、企业开工不足，所以我们不可能有通胀。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原理。

房地产业深陷困境



来源：http://news.stcn.com/news/202205/t20220516_4536296.html

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如上图，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增速从去年年初的增长最高峰68%跌到现在，同比增长都为负，跌幅很大。全国排名前100的房企跌幅更大，销售额、拿地规模等“腰斩”，甚至更严重。

我们应该对房地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过度关注房地产的负面作用，这对我们的政策制定不利。

中国住房够了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面积增长了19倍，这的确是很大的成就，但国际比较会发现，我们的住房面积还不够。我国人均住房面积仍低于日本，而且住房质量远低于发达国家。

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根据任泽平团队的计算，房地产对GDP的贡献是17.2%，间接贡献比直接贡献更大。房地产是一个链条极长的产业，对上游和下游的影响都很大。房地产一开工，钢筋水泥等需求上升，后续装修、家用电器、家具等采买也跟着上升。所以，房地产业对GDP的贡献和出口对GDP的贡献差不多，是经济复苏可靠的主力之一。

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如果我国房地产下降1/3，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经济挖了一个负5%左右的大坑，现在必须先把大坑填平才能有正增长。我认为，房地产下降太快是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

经济增长减速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多人都在谈预售制，谈“三条红线”问题。

“三条红线”政策就是针对预售制，想要控制房地产企业过度的信贷扩张。但我建议大家深入分析一下预售制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预售制只在中国盛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银行系统对于房地产企业的信贷不足，而非太多。预售制是房地产企业得到流动性的一个关键模式。尽管我们都不喜欢预售制，但要取消预售制，一定得先把银行调动起来，承认房地产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

现在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5,000亿的救助基金，央行也提供了1万亿美元的贷款，目的是鼓励房地产企业交房。这是保民生，当然有必要，但我认为更根本的是要保信心。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老百姓和银行对房地产业都丧失信心。如何重建信心？我建议政府应该拿这笔资金去购买房企的股份，由此释放的信号是政府对房地产业投了赞成票，能够起到稳定市场信心的作用。政府买1%的房地产股份即可，银行一看政府投了赞成票，就敢于放贷，老百姓一看政府有信心，也就恢复信心。我们一定得把经济增长的这个底盘筑牢。房地产业继续这样降下去会引发很大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问题，还有金融等衍生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提振消费和优化防疫政策十分重要

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在我看来，如果能够保证4%的增速已经很好。所以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已经不再提增长目标，给我们的经济减，这是对的。

下半年除了房地产之外，最应该关注的还有消费。7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下半年发力要在消费上面。

消费怎么发力？中国经济现在的瓶颈就在消费端。因为供给侧产能过剩，需求侧中的投资一直不振，所以要想靠投资去拉动经济的难度很大，必须促进需求侧中的另一个支柱：消费。



消费怎么促进？我还是坚持两年来的观点：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银来促进消费，比如发行特别消费国债，主要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低收入家庭和失业者。发行量建议为 1.4 万亿，各个省根据自己的需求认购，然后自己偿还。可以用消费券的形式，但最佳形式是直接发发现金。

提振消费有什么好处？消费能直接计入 GDP，发 1.4 万亿的消费券，如果大家都用掉，就创造 1.4 万亿 GDP。间接的还有乘数效应，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可以达到 3-5 倍，现金的乘数效应小一些。哪怕乘数效应只有 2，也是 2.8 万亿，对我们经济的影响就是 2% 左右的 GDP 增长，而且不太可能有通货膨胀。这是第一个措施。

第二个措施：建立长效防疫措施。新冠病毒

不可能消失，会逐渐演变成与人类共处，这是科学规律。我们应当增加防疫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把措施落到实处。比如实施社会“活动面”动态清零，保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员中没有感染即可；不再实施全城静默、不再封城；划定防控检测范围不要按照区县来划，缩小范围；统一全国健康监测数据，统一全国防疫措施；开放国内旅行，乘坐交通工具不再区分疫区和非疫区，以全国通用的健康码和核酸为准，开放国际旅行等。

我们有很多防疫专家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我相信一定能够制定出更加精准的防疫措施，在保增长和防疫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这件事做好，我们的消费才可能得到良好的恢复。

伯南克做到了“不浪费一场危机”⁷

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丘吉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不要浪费一场好的危机。”只有认真地分析危机的起因、传播及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规则、改变行为，才有可能避免危机重演。只有不停地反思，才有可能持续进步，不然只能永远在原地打转。

曾经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是这种反思理念的践行者。他的学术生涯主要专注于对大萧条的研究，清晰、严谨地论证了大萧条发生、持续的主要原因。他曾经说：“我喜欢研究美国大萧条，因为它是现代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从专业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从对美国大萧条的研究中体会到很多经济运作的规律和本质。”后来他又把从研究中获得的心得运用到政策实践中，真正做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相传伯南克刚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去跟后来担任过以色列央行行长和美联储副主席的导师费希尔讨论博士论文题目，费希尔建议他先去读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1960》，看他对这本书的反应再确定选题。后来伯南克回忆道：“读过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后，我对大萧条的问题着迷了，就好像那些研究南北战争的爱好者一样，我不仅找到所有关于那段时间经济的书和资料来读，还看政治、

社会、历史方面的。但核心的问题——我管它叫宏观经济学的‘圣杯’，还是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如此严重。”

后来伯南克的博士论文及之后的很多研究都是围绕两个学术问题展开的，一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萧条，二是为什么衰退持续了这么久。他的学术发现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货币因素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名义工资调整困难妨碍了经济复苏。这两个结论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货币是中性的，价格高低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但确认货币因素导致了经济衰退，实际是否定了货币中性的认知。货币供应不足容易导致通货紧缩，这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从而把经济推入衰退的境地。而名义工资调整慢于价格水平，可能会使劳动需求减少，这样就会拖延经济复苏的步伐。也正因为如此，伯南克十分赞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对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没有奋力增加货币供应而提出的严厉批评。

美国学术界确实没有“浪费”大萧条。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研究大萧条问题。伯南克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艾肯格林是另一位领军人物。关

7.本文为黄益平为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南克2022年新著《伯南克论大萧条：经济的衰退与复苏》一书所作的推荐序。



于大萧条的经济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多的学术成果，总体来看，这个领域特别符合好的研究的几个基本特征：问题很重要、研究有意思、结论有影响。

大萧条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第一场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研究大萧条等于抓住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学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来自现实世界。伯南克一再声称他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研究大萧条，关注的并不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搞清楚这样一些可能影响大局的经济关系，比弄清楚一些细枝末节的历史事实更有意义，也比验证一些已经被验证过无数次的经济关系更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都是在萧条之后逐步形成的。

这个研究确实也非常有意思。大萧条期间究竟是货币收缩导致经济衰退，还是经济衰退使得货币收缩，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早先的研究一直局限在美国本身的数据，上述因果关系不太好识别，更不要说有不少学者认定货币是中性的。这项研究的突破来自国际比较研究的引入，就一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大萧条，说不清楚谁引发了谁。但有了跨国数据，就可以按照大萧条发生之后推出金本位制的先后，来考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结论是退出金本位制较早的国家，经济复苏也比较快。原因是在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量是由黄金储备决定的。一旦退出金本位制，货币供应就可以灵活调整。

这些研究结论后来产生了重大的政策影响，促进了货币政策框架的形成和金融监管框架的完善。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在确定美元盯住黄金、其他货币盯住美元的基础上，允许各国不定期地根据需要调整汇率，实际就是吸取了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不够灵活的缺点。可惜的是，后来这个设计没有发挥作用。因此，到1971年美国就放弃了美元盯住黄金的安排，走向了浮动汇率制。大萧条研究对政策最直接的作用，反映在伯南克执掌美联储期间所采取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扩张。换句话说，他的政策是有多

年学术研究支撑的。

伯南克本人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学者，他后来有机会进入中央银行参与决策，特别是在次贷危机期间执掌美联储，也算得上是传奇的人生经历。在离任之后出版的《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一书中，伯南克对其在次贷危机期间所经历的惊涛骇浪般的风险和左右为难的政策选择有详细的记载，从中还能看到他作为学者出身的央行行长在做决策时所展示出的学者风格。当然，由学者而央行行长，这样的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些政策意见或者建议，应该是大多数经济学者都有机会做到的。

《伯南克论大萧条》是一本论文集，收集了过去几十年来伯南克所作的关于大萧条问题的经济学研究论文。与回忆录相比，论文集的技术性稍强一些。好处是可以仔细地了解这些问题的提出、数据的收集、分析的过程以及最后结论的得出，其实还可以学习如何做学术研究。而对话题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则可以更多地关注话题的重要性、分析的逻辑及其政策含义。伯南克专门为本书撰写了第一章“大萧条时期的宏观经济学：比较分析方法”，这是一个写得非常好的综述，系统地阐述了问题的提出、分析的思路，以及一些主要的结论，对分析细节不感兴趣的读者，直接阅读这一章即可。

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最主要的原因并非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大萧条发生、持续的机制，而是因为在大萧条发生将近80年之后，世界经济在2008年再次遭遇一场全球性的危机，12年之后，又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在这两次大危机期间，各国政府与央行都采取了“不计一切代价的政策”稳金融、稳经济。顺便说明一下，提出“不计一切代价的政策”这个说法的是十年前时任欧洲央行行长、现任意大利总理，同时也是伯南克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师兄德拉吉。这些超常规的政策对于经济复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这些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

于对大萧条时期经历的分析与总结。

不过现在世界经济甚至世界货币体系又碰到了新的问题。正因为意识到金本位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对货币体系的要求，各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逐步走向浮动汇率制。而为了在保持货币政策灵活度的同时维持币值稳定，许多央行采取了通胀目标制。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货币政策规则是有效的，帮助维护了货币体系与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最近 20 年的经历则表明，货币政策与通胀水平之间出现了脱钩的倾向。在伯南克的前任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货币政策宽松，通胀水平稳定，但金融风险大量积累。因此，继续盯住通胀水平，是否还能保持货币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如果不能，

应该如何改革货币政策的规则？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次贷危机，还是新冠疫情，都可以称得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些危机中是否出现新的值得深入研究的宏观经济机制？这些新机制对经济政策与制度安排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次贷危机是一场典型的全球性的系统性金融危机，什么导致金融风险同时发生甚至形成顺周期机制？货币政策要不要管金融风险？过去十几年，关于次贷危机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政策改革的尝试也很多，但像大萧条之后出现的革命性的学术与政策进展并不多。最近发生的这些大危机会不会最终被“浪费”掉，这是当代经济学者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而这也恰恰是推荐大家阅读《伯南克论大萧条》的最重要的原因。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能够成功的条件与机制 ——三个典型产业案例的初步研究⁸

范保群

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陈小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超

北大国发院助理研究员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站立成本”

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除可参考发展经济学、新贸易经济学、国家创新系统、创新经济学、国家竞争优势等理论。更要特别关注与产业培育政策关系非常密切的“站立成本”（set-up cost）理论。

“站立成本”理论认为：追赶中国的企业，为获得基于动态规模经济性和干中学的时间经济性引起的动态效益，必须解决产业“站立成本”问题。“站立成本”是企业发展到按国际价格可以赢利时必须付出的成本；站立成本与企业进入市场的时间有关，先进入国家的企业已建立了进入壁垒，后进入国家的企业要生存下来就必须解决站立成本；解决的条件之一是企业能达到克服站立成本障碍的必要规模；条件之二是有相应的产业政策。解决站立成本问题，大国由于经济体量的规模优势往往更容易达到克服站立成本障碍的必要规模，因而对大国的企业而言，比较有利。

“站立成本”理论为产业政策的意义、有效条件提供了较好的理论解释。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工具与政企互动机制

政策效果与政策作用方式及工具选择有关。支持所选产业或者领域确定后，就要选择相应的政策工具。存在多种政策工具可选，按作用及其激励指向分为三类：供给激励政策，作用是帮助提高企业的供给能力；需求激励政策，作用是帮助企业获得及扩大市场；改进基础环境，从环境方面激励企业发展。在解决站立成本的前提下，政策工具选择的依据是政策成本小、信息成本低且激励相容。

政策的形成及调整机制更为重要。在这个机制中，政企互动尤为关键。即政府就产业政策及相关的政策思路、规划、项目等与企业进行交流讨论。互动是信息、知识的双向交流，政府和企业都可以是互动的发起者。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政企互动已经成为中国政策形成及调整完善的基本机制。本文发现不少领先企业（家）都曾因为政策问题而困惑乃至无奈，而后通过与政府的互动推动了政策的调整，改进了企业或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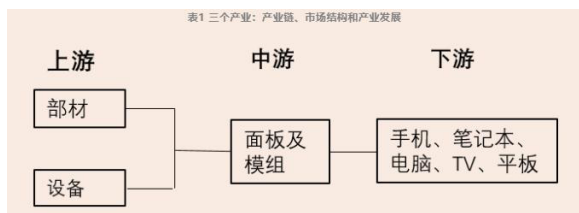
8. 本文刊于《中国经济学》2022年第1期

三、基于产业链和价值链分析的整合性政策分析

本文通过以产业链和价值链分析为基础的整合性政策分析方法 (Industrial Chain and Value-Chain Based Holistic Policy Analysis, 简称 ICVC-HPA) 来探讨政策与产业关系 (分析了三个产业的情况, 详见表 2)。通过价值链、产业链两方面的政策分析相结合, 帮助形成基于企业需求、覆盖产业链价值链整体同时有重点的政策体系。

四、三个产业的实际情况

(一) 三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情况 & 政策目标: 产业链、市场结构和发展情况



(二) 政策内容与结构

1. 政策内容 (详见表 2)

三类政策存在着配套协调关系。其中, 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的协调最为重要。

表2 整合性政策分析方法看显示 (液晶)、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结构

		供给政策					需求政策				基础环境		
		技术		设	资本	土	保护	创新和扩	设	技术	技术	规则	
		财	规	备	投	地	财	规	务	规	机	特	
		务	划	资	资	务	制	制	制	构	定	一	
				资	资	制	制	制	制	构	定	一	
				资	资	制	制	制	制	构	定	一	
显示 (液晶)	屏板	√	√	√	○	√	√	√			√	√	√
	材料零件	√	√	√	○	√					√	√	√
集成电路	设备	√	√	√	○	√					√	√	√
	设计	√	√	√	●	√	√	√	√		√	√	√
	制造	√	√	√	●	√	√	√	√		√	√	√
	材料	√	√	√	●	√					√	√	√
新能源汽车	设备	√	√	√	●	√					√	√	√
	整车	√	√	√	○	√	√	√	√	√	√	√	√
	电池	√	√	√	○	√	√	√	√	√	√	√	√
	材料	√	√	√	○	√	√	√	√		√	√	√

说明: 1. √: 中央有政策或在中央授权范围内地方有政策。
 2. 资本栏中的两个指标: (1) 投资: ● 中央有大规模投资 (基金等), ○ 地方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 √: 中央有政策或在中央授权范围内地方有政策; 空格: 表示没有政策或者作者没有掌握。(2): 财务, 指投资补贴、税收返还等财务性措施, 不包括针对研发、设备进口等专项的财务性支持措施。

2. 政策调整

这三个产业的有关政策一直在动态调整。

(1) 调整支持对象及重点。有“退出”, 液晶产能 2010 年是政策支持对象, 2016 年以后不再支持。有“进入”, 显示产业 2016 年后重点支持 AMOLED 等新型显示产品及材料、设备技术, 2016 年新能源汽车“三电”发展的重点明确为高效率电机、高能量高功率电池, 支持智能网联、自动驾驶及能源回馈技术的研发和合作发展。

(2) 调整政策工具及其使用方式和机制。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政策工具, 开始主要是国家的科技专项支持和公用车补贴, 以后增加了消费者购车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2010 年以后乘用车购车补贴是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最重要的需求激励政策之一。随着企业发展, 补贴标准不断下降, 2018 年开始实行双积分制度。

(3) 调整技术标准。电动汽车补贴的技术标准也不断提升, 补贴下限 R 值 (续航里程) 开始为 80-150 公里, 2018 年 6 月后补贴下限提高到 150 公里以上。

(4) 改进政策管理模式。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曾出现钻政策空子的“骗补”等问题, 以后改进了补贴管理方式调整为实行双积分。

政策适时调整是这三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有效的重要条件。

(三) 政企互动: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形成及调整完善的过程和动力机制

政府企业互动对产业政策的形成及调整有重要影响。

1、影响政策形成。主要的方式是企业与专家通过上书或会议发言等多种方式呼吁、建议主管的政府官员和高层政治领导考虑国家出台有关的支持政策。例如, 显示行业龙头京东方呼吁国家出台支持政策推动液晶产业发展成为战略产业;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政策出台是



企业（家）和专家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国家出台支持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出台的重要基础是调研比亚迪后的《一个解放思想走在时代前列的自主创新典型》报告，建议国家支持企业创新及电动汽车发展。这些产业创新者和先行者的企业（家），有推动政策出台的动力，又能用自己的行动及成果说服政府出台或者政策调整。

2、推动政策的调整完善。开始时政策未必完善，政策实施过程中实际情况往往也是变化的。以新能源汽车政策为例，实际执行中出现了“骗补”问题，因此就要调整改；为了支持“新势力”企业及投资者进入，也调整了过去的严格限制进入的“目录管理”办法，2017年又出台双积分制度及明确有关的技术和经济标准等新政策，都经过了政府有关部门与产业界多次沟通协商。

3、政企互动从个体行为变成集体与个体并行的行为。行业集体与政府的互动，过去主要指各种行业协会与政府的沟通。现在出现更多的集体沟通方式，例如各种企业联盟与政府的互动沟通。政府部门也日益重视各种组织，特别是重视与产学研环节都有很多重要成员参加的组织。例如，“电动汽车百人会”就是新能源汽车产学研各界反映企业声音、政企互动凝聚共识的平台。国内类似的平台越来越多。

4、政企互动是功能作用不同的多种组织共同参与政策的过程。政府和企业是政企互动的主角，政策咨询研究机构有重要作用，专家、资深官员及各种意见领袖往往也有重要影响。在显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形成和调整的过程中，各类组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政策效果：已取得初步成功

总体来看，三个产业的发展虽然还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在政策支持下都已有较好的发展、都已取得较好的效果。微观上看，可以认为这三个产业站立成本问题已基本解决或者初步解决或者有了解决的基础，都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产业整体得到较快发展；拉动了产业链上游发展、强化了下游支撑，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强化了市场竞争性，印证了支持创新追赶的产业政策有鼓励竞争的作用；政策成本和达到的效果相比，是可以接受的。

五、主要发现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是一定内外条件下，为促进特定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政府与市场及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及其组合政策，应根据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性质和产业链价值链特点进行设计和实施，并且适时动态调整。

政企互动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形成、调整和完善演进的重要因素和能够成功的必要机制。

追赶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可以成功，条件是政策能解决关键问题和适时调整。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关键政策及体系能立足于国情并与市场机制和企业能力提升有机地结合。

数字时代的劳动力市场：转型与挑战⁹

李力行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

莫怡青

北大国发院博士研究生

周广肃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在过去的十年里，全世界的大型数字平台企业获得了迅猛发展。平台经济的兴起，不仅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还带来了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对整个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中国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于2019年的估算，中国数字经济2018年的就业人数已达到1.91亿，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因此，理解平台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数字时代的就业

数字时代的就业相比于传统时代有了很多新特点。首先，从工作岗位的数量来看，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一部分传统岗位会被机器人代替，如流水线工人被工业机器人代替。另一部分岗位则伴随着技术的使用被创造出来，如外卖平台的兴起创造了大量骑手的工作岗位。

其次，许多工作不再要求现场办公。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可以在线上合作与协同。同时，由于数字技术的兴起，更多工作在时间上变得更加灵活。从公司角度来说，技术进步有助于使任务标准化，降低监控和监督成本，从而更容易为劳动者安排灵活的时间表。从劳动者角度来说，可自由选择工作时间，本身亦能带来效用的增加。

最后，在数字时代，劳务外包越来越成为流行趋势。劳务外包不需要维持大量的固定员工，可以为企业节省巨额成本。但是在传统时代，劳务外包提供的服务质量常常难以得到保障。数字平台的出现则通过数字技术为劳务外包的服务质量提供保障，使公司能够更多地进行劳务外包。

数字时代的创业

数字平台对创业活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创造出大量不同于传统雇佣关系的“零工经济”工作岗位。一方面，这些工作依托于平台，为劳动者提供了收入保障。另一方面，创业的机会成本也随之升高。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平台进入减少了当地的创业，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一负面影响主要存在于低技术行业。

在数字时代，创业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大型平台企业纷纷构建自己的数字生态系统，并催生了许多“平台依赖型企业家”依托平台开展创业活动，最终产生了许多深度依赖于大型平台的新兴企业。

此外，平台经济创造的“零工经济”岗位模糊了传统雇员和自主创业之间的界限，使得创业的定义更加复杂。

9. 本文采编自2022年第二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Platform Economy and China's Labor Market: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Policy Challenges”。



数字时代的企业组织

从组织的角度理解数字平台对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的影响尤为重要。

数字技术首先对企业的边界和规模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变得更加容易。交易成本的下降和任务的标准化使得许多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应过程得以分解并外包给市场。许多公司选择通过裁减非必要员工和外包非核心流程来“瘦身”。数字技术还对企业的内部组织产生了巨大影响。伴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也发生着转型。简而言之，数字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程序的分解和外包，促进了分工，并导致分权、非组织化、非中介化和非公司化。最终促进了组织层级的扁平化。

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对理解平台经济下的雇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全日制就业已在一定程度上被灵活就业所取代，特别是基于平台的兼职工作的性质介于就业和自主创业之间。一般来说，零工平台起到招聘、任务分配、付款和质量监督的作用，但并不把在平台上灵活就业的劳动者视为员工。这类工作不像自主创业那样独立，劳动者仍然依赖于平台来接收任务并获得报酬。

数字时代的劳动保障

数字平台创造出了新的灵活就业方式，同时也为劳动保障带来了新挑战。在中国，目前法律框架采用了“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的二分法。一般来说，全职员工通过签订“劳动合同”与雇主建立劳动关系。除支付工资外，《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还要求雇主向工人提供各种工作福利和社会保险。

另外，个体经营者还可以通过履行“服务合同”来提供劳动或服务，与雇主建立民事关系。这一关系受《民法》保护，且意味着服务接收方

只需支付劳动报酬，而不负责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这种就业关系的二分法框架旨在匹配两种传统类型的就业，即全职就业和自主创业。然而，基于零工平台的灵活就业介于二者之间，如果发生劳动争议或伤害，劳动局（或法院）必须在二分法框架下做出裁决以解决争议。如果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雇佣关系被归类为“民事关系”，他们在与平台谈判时往往将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

针对这一情况，许多国家正在重新划分就业关系并调整劳动保护制度。大多数国家对雇佣关系采取了“三分法”认定，即依赖零工平台的劳动者被划分为单独的类型。许多国家的改革旨在扩大劳动者权益。

中国有大量依托零工平台就业的灵活就业者，他们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问题已引起政府关注。政府使用“新型就业”一词来指代这些人，并正积极调整相关政策。总体而言，目前的监管遵循“包容审慎”的指导方针，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除了“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之外，还确立了“非标准劳动关系”，并相应地界定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其次，解决社会广为关注的紧迫问题，例如工伤保险。最后，要求平台公司在制定与劳动者权益直接相关的规则和算法时，听取劳动者的意见。

社会保障则是另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基金集中程度低、养老金跨地区转移困难以及个人账户尚未实现。许多劳动者也缺乏支付社会保障金的意愿。因此，建立起可跨地区转移的个人账户是，为灵活就业的劳动者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有必要进一步探索适合这一类型劳动者的养老金缴款计划。

总之，在数字时代，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本质变化。政府应完善监管体系，以纠正平台缺乏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问题。首先调整现有的劳动法律框架，改革劳动保护制度，以适应灵活就业工人的情况。然后调整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并逐步完善养老金体系。



一、2022年9月19日，北京高校2022年度“优质本科课程”和“优质本科教材课件”遴选结果揭晓，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3年）赵耀辉主讲的公共课“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分析”入选2022年北京高校“优质本科课程”。

二、2022年9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学“喜迎二十大，携手新征程”统战人士国庆座谈会举行，校党委书记郝平出席。全国政协常委、无党派人士、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受邀出席并发言。他表示，党外人士要在百年变局中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完成。

三、2022年9月28日，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第160期举办，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CSIS）中国商务和经济学高级顾问兼主管 Scott Kennedy（甘思德）博士以“扩张、

脱钩，还是重整？全球商界重估中国机会”为题分享其最新调研结果。北大国发院院长、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点评。

四、2022年11月1日，《财富》杂志中文版发布本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榜”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未来榜”，评出50位国内各行业最杰出的女性领导者，以及49位中国新崛起的女性企业家、职业经理人、行业新星和意见领袖。多位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同学和CHO100成员上榜，包括：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新希望集团董事长、EMBA2004级校友刘畅，泰康保险执行副总裁兼泰康养老董事长、EMBA2003级校友李艳华，辉瑞中国区副总裁兼市场准入负责人、EMBA2007级校友钱云，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人力资源官、CHO100成员乐海雯，元气森林联合创始人、EMBA2021级同学鹿角（路皎），以及华大基因集团执行董事兼执行副总裁、CHO100成员朱岩梅。

版 权

主 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主 办: 北大国发院智库 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主 编: 黄卓
执行主编: 王贤青
执行副主编: 白尧
编 辑 部 (按姓氏拼音)
曹毅、高玲娜、刘海波、王勋、王志勤、朱丽

电子订阅方式

扫描本二维码，填写联系信息



合作联系方式

电话: 010-6275 9033
邮箱: ybai@nsd.pku.edu.cn

官方网站

www.nsd.pku.edu.cn

官方微信公众号



北大国发院



北大国发院智库